

【国际关系理论】

窗口预期与崛起国应对战略透支风险的启示

秦立志

【摘要】关于崛起国面对战略透支风险时选择风险规避或风险承担的动因,作者提出了窗口预期这一核心研究变量,它同时涵盖对过去的历史类比经验、对现状的满意程度以及对未来前景的损益评估。窗口预期的形成机制包括战略动机、地缘政治地位、经济相互依赖和军事攻防平衡四要素。如果形成损失偏好的消极窗口预期,就会产生沉没成本、夸大威慑效果和“托克维尔悖论”的共同作用,进而强化风险承担决心,诱发螺旋模式的冲突升级,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如果形成收益偏好的积极窗口预期,则更可能导致风险规避,出现相对稳定的威慑模式,跨越“奥古斯都门槛”。风险规避和风险承担都只是应对策略而非实际结果,这源于国家间的战略互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对1871-1914年的德国和1894-1941年的日本应对透支风险的选择动因分析验证了窗口预期的形成机制和战略影响:即使缺乏客观的进攻优势、没有明显的防御弱点,国家仍可能由于消极窗口预期选择风险承担。只有在大国战略关系中充分权衡己方观念和和行为所造成的系统效应,实现理性与克制的决策,才能减少崛起进程中的战略透支风险。

【关键词】战略透支;窗口预期;风险承担;风险规避;崛起国

【作者简介】秦立志,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大连 116044)。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21.11.95~133

一、引言

大国崛起的理论与实践从来就不乏战略规划,成功的崛起战略必然要充分兼顾空间与时间变量。如何获取更多的缓冲地带与更长的战略机遇期是崛起国重要的战略关切。在重大历史时刻,崛起国究竟是应该选择风险承担(迎难而上)还是风险规避(体面退却),是保持韬光养晦还是更注重主动出击,这是摆在政治家和国际关系学者面前的永恒主题。法兰西第一帝国执着于征服欧洲的军事行动,谋求挑战英国的制海权,错失了延缓和阻止英国构建反法联盟的机遇。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以足够的战略耐心推动了渐进式崛起的路径并获得成功,而威廉二世(William II)放弃了以和平方式获得欧洲大陆主导权的战略机遇,陷入了体系大战导致崛起失败。如果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将德国发动战争的时间延后数年本可能有更大的胜算。^①威廉二世与希特勒都试图压缩时间,以期提前实现

战略目标,从反事实推理出发,如果他们在既定的时间段里设定合理的战略目标,或者为目标的达成设定合理的时间限制,战略效果可能会截然不同。

回顾历史,崛起国在面对战略透支风险时,往往选择规避风险而非承担风险,保持目标与手段的平衡更有利于促进崛起进程。但战略是一门艺术,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良好的战略意图与高明的战略计划不能保证战略的成功效果,缺乏理性的战略也未必导致负面效果。战略家无法超越历史迷雾,以绝对理性的视角看清所有潜在选项所导致的确切后果,这意味着驱动国家选择风险承担或风险规避的窗口预期可能是虚幻的。对国家战略的考察应注重分析不确定性,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国家战略都可能出现目标过高和手段不足的状况。本文旨在解释窗口预期的形成机制及其对战略透支的影响。笔者将窗口预期划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发现消极的窗口预期会增加战略透支风险,积极的窗口预期

会带来风险规避。既有研究大多将窗口预期作为自变量解释战略透支的形成,本文对窗口预期分别进行了因变量(形成机制)与自变量(作用机制)的系统研究,考察窗口预期的战略可塑性及其与战略透支风险的关联性,揭示崛起国与霸权国的“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安全困境的必然结果,进而建立现实主义、地缘政治学与战略理论的联系,加深对崛起国战略选项的形成动因分析。此外,本文汲取大国应对战略透支风险的历史经验,识别对手国关于行为体互动趋势的战略预期,为战略透支风险的早期预警与风险管控的应对策略提供启示。

二、已有解释及其不足

已有文献对国家选择风险承担或风险规避的窗口预期诱因分析可概括为三个层次:一是体系因素。外部战略环境为国家提供了机遇和威胁预期,如国家看到宽松环境提供的扩张机遇或者面临强敌入侵的重大现实威胁等高清晰度战略环境时,崛起国会更少受到国内政治变量的影响而选择承担战略透支风险。^②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强调大国针对能力而非意图建立均势,如果国际体系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必然发生剧烈的安全竞争。^③他认为大国战略冒险的收益率很高,成功的案例多于战略透支的情形。只有面临跨越大洋的水体阻遏力量时,国家才应该采取离岸平衡战略而非征服战略,以降低战略透支风险。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指出,一个经济权力和潜在权力正在衰退却拥有短暂军事优势的大国容易发动体系规模的战争。^④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认为,当国家预计现在开始一场战争比以后开始一场战争有更好的结果时,国家更倾向于利用正在缩小的机会窗口进行战争冒险。^⑤孙学峰提出了由权力转移引发的“崛起困境”的概念:国家在崛起进程中面临着既要维持综合实力上升和影响力扩展,又要尽可能降低外部安全压力的两难局面。^⑥

二是国家因素。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分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以及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美国的过度扩张行为,指出“多米诺骨牌理论”及其“温泉关理论”、关于对手的“纸老虎意象”、关于同盟生成的

追随理论与“大棒理论”、对进攻优势所抱有的信念、关于采取预防性行动的“机会窗口”的认识以及关于征服会带来收益的“黄金之国”战略观念盛行都与过度扩张的倾向密切相关。^⑦杰弗里·托利弗(Jeffrey W. Taliferro)提出了“资源汲取型政府”的概念,以19世纪下半叶中国和日本面对西方殖民扩张压力所采取的不同战略调整路径为例,认为国家制度、国内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会影响资源汲取或战略动员的相对能力,因而面对相似体系压力却出现不同应对模式。外部脆弱性程度要通过国家内部变量的过滤才会对战略的延续或调整构成影响。^⑧格伦·斯奈德(Glenn H. Snyder)用前景理论分析领导人接受风险和厌恶风险的倾向,损失预期可能会让领导人采取冒险战略介入边缘地带冲突。^⑨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分析了国家战略偏好对冒险倾向的影响,指出当帝国主义国家而不是维持现状国家占有军事优势时,最容易爆发战争。^⑩约翰·赫茨(John H. Herz)指出国家诉诸成本和风险高昂的暴力行为是出于恐惧的缘故,陷入安全困境具有一种“宿命论式的不可避免性”。^⑪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指出,国家战略出现意图之外的效果是因为各国行动及彼此互动的环境影响了互动结果。^⑫

三是决策因素。有学者将战略文化与战略心理作为分析变量,解释国家由于安全担忧、军国主义或追求帝国荣耀而倾向于采取冒险行为。^⑬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提出假设:一旦荣誉和地位成为核心问题,领导者便愿意承担相当大的风险诉诸战争。^⑭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认为历史上频繁受到外敌入侵孕育了苏联传统的不安全感,使其选择扩张来减少入侵危险。^⑮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解释了国家在战略互动中的过度反应心理:将敌人误认为朋友的代价是极端惨重的;将朋友错当成敌人,代价则不会如此之高。因此,决策者宁肯犯后一种知觉错误也不愿因犯前一种知觉错误而招致危险。^⑯他列出了容易诱发大国战略竞争升级或反应过度的心理机制,包括认知一致、诱发定势、镜像反映、集团思维和知足常乐(扭曲倾向)。^⑰也有学者提出国家对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匹配度是影响风险承担—风险规避决策的重要根源:如果战

略制定与战略动员出现目标过高、手段不足,既定战略目标在行动中不断实现扩张性收益就可能目标追求扩大化,以及在与其他国家的战略互动中出现安全困境或冲突的螺旋升级。^⑧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 Gilpin)认为,一旦进一步的变革与扩张在成本和收益上达到平衡,维持现状的经济成本比支撑现状的经济能力上升得更快。^⑨查尔斯·克拉泽(Charles L. Claser)考察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日本帝国的军备扩张案例,论证了物质和信息变量对崛起国战略目标扩大化的影响。^⑩杨原分析了战略互动进程中的对抗逻辑,提出如果霸权国的遏制逆转了崛起国原有的乐观预期或者霸权国挑战了崛起国捍卫自身重大利益的决心,崛起国会倾向于选择强硬和对抗性政策。^⑪

即有研究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对地缘类属身份与风险承担的相关性研究不足。相比中心国家,侧翼国家在规避战略透支风险方面具有更大优势。如果说中心地带国家的某些战略透支案例受限于强敌环伺和地缘挤压,那么位于侧翼地带的海洋国家在崛起进程中为何仍可能倾向于选择风险承担?“自我包围”和“过度扩张”的观点主要适用于深陷陆疆安全威胁或陆上领土扩张诱惑的陆地强国;对海洋国家而言,只有当它觊觎大陆征服或面临陆上崛起国的海上战略冒险行为时,才可能因螺旋模式出现地缘空间的过度扩张。这是由于海权力量活动范围的扩大不一定带来军备成本迅速提升和外部制衡压力激增。

既有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缺乏空间与时间维度的结合。核心地带竞争通常发生在崛起国尚未获取体系主导权认可地位的时期,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权力地位上升持有修正主义的进攻性战略偏好。边缘地带竞争通常发生在崛起国与霸权国达成某种战略均势之后,核心地带竞争在时间顺序上先于边缘地带竞争。^⑫这种时间位差效应有待进一步探讨,如崛起国的风险承担决心是否会压缩对手国的窗口预期范围以及基于时间维度的互动升级会改变双方的初始窗口预期。

既有研究的第三个问题是相对忽略了窗口预期理论对于崛起国和霸权国的不同影响,对风险承担

的成因分析不能局限于战争阶段,而是应该贯穿战略博弈的进程始终。本文列出崛起国应对战略透支风险研究的三点特殊性。

首先,崛起国在战略思想的酝酿、战略计划的制订和战略行动的初期不太容易确定自身是否出现透支。初始阶段可能由于外部制衡不足、本国实力上升或被收益高于资源损耗所掩盖的透支隐患,仍抱有暂时性损失会带来长远收益的乐观前景预期。透支被明确感知需要达到临界值,包括受限于资源内耗带来的观众成本和国内政治经济不稳定、对前期沉没成本的关切上升和对未来收益预期下降以及由于其他强国愿意投入制衡能力与决心提升所增加的行动代价。

其次,崛起国面临的体系制衡压力具有不确定性。当体系中只有一个崛起国且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实力差距缩小、同时两国与其他主要国家的实力差距在不断扩大时,崛起国遭受的制衡压力较高。如果崛起国以挑战霸权国核心利益为目标采取代价高昂的冒险行为,那么霸权国会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制衡崛起国。当崛起国数量众多、霸权国实力衰落或崛起国采取低调扩张时,霸权国和其他大国可能对崛起国形成不制衡或制衡不足。即使崛起国面对明显的制衡压力,如果不做进攻性战略回应或采取战略收缩,也可以规避透支风险。

最后,对战略透支的风险评估具有动态特征。战略扩张并非必然带来透支,只有当进一步扩张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时才表明一项战略得不偿失。霸权国陷入战略透支的重要根源是对难以逆转的长期潜在权力衰退的担忧,国力下降限制了战略调适的空间。如果崛起国能够提升战略缔造能力,协调目标与手段的平衡性,就能及时止损、降低透支风险。

目前学界既有研究缺乏对窗口预期概念的操作化,相关理论假设的适用范围、内在逻辑和解释力都存在完善空间。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历史层面剖析崛起国战略透支的特殊性,从战略互动视角对深层原因与直接原因进行动态分析,探究由窗口预期引发的决策过程与战略行动以及面对体系制衡的压力反馈如何生成威慑模式和螺旋冲突模式。

三、核心变量与解释机制

“战略的缔造既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征,又涵盖外部事态和威胁的压力的过程。”^②一个完整的大战略包含战略动议(“集思广益”)、战略思想、战略计划、战略行动、体系反馈和延续/调整现有战略等复杂过程,窗口预期对战略透支风险的影响贯穿战略进程始终,二者间存在因果机制。^③定性研究的理论必须讨论因素和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试图通过时空约束,讨论窗口预期的形成机制及其与崛起国应对战略透支风险的因果关系,构建有助于对相关历史案例进行过程追踪的理论框架。^④

(一)窗口预期的理论解析

对窗口预期的考察包括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空间维度指崛起国与其他大国在中心地区(即地缘距离邻近崛起国且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博弈,时间维度指国家在“现在行动”“未来行动”与“不作为”之间的战略选择。当双方都陷入时间紧迫、空间选择有限的悲观窗口预期时,彼此的窗口判断会由于互动进程进一步强化,本国的窗口预期及相应行动的变化也会改变对手国的窗口预期。当国家做出战略行动时,不论其他国家是否反馈以及何种互动方式都会涉及成本投入;风险只有在战略行为得到他国的正反馈/负反馈选择并在“升级冲突”和“让步合作”之间做出进一步选择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影响效果判定。简而言之,成本来自单边行为的付出,而风险指的是战略互动中对手反馈带来的不确定性效果。国家通常倾向于高估对手国进攻行为的蓄意性与修正主义动机,却将己方的进攻性行动视为非本意的维持现状动机,这种错误知觉一旦表现为损失厌恶的窗口预期,甚至可能让国家甘愿承担体系大战的悲剧代价,即选择风险承担。

大国兴衰周期律意味着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权力转移通常是零和博弈,但崛起国挑战霸权国失败时也存在及时止损的调整期,因此战略透支与战略失败并不等同。追求确定性是正确认知风险的阻碍:对确定性的判断很可能是错误知觉,这会容易形成某种认知模式,不愿意接收那些与自身既有模式相悖的信息。确定性决策是理想情形,只有在双方权力差距过大、战略决心差异较小且没有第三方介入

等条件具备才可实现。在不确定的战略环境中,必须区分已知风险和未知风险:在风险已知的世界里,包括概率在内的所有事物都是确定的,统计学思维和逻辑思维足以做出明智的决策;但是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并非所有事物都是已知的,无法通过计算做出最佳选择。^⑤

基于损失预期,国家偏好风险承担的意愿要强于收益预期下的风险承担意愿。当国家预期维持现状的防御风险非常高昂而消除威胁的进攻风险更为低廉时,国家选择风险承担的案例并不罕见。1754—1756年,法国预期英国未来会变得更加强大并将阻碍法国在亚洲和美洲的经济竞争力恢复,进而威胁法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地位,这诱发了英法“七年战争”。18世纪末英法关系恶化加剧了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关于未来贸易环境的悲观态度,因此发起对英国的战略对抗和在欧洲大陆的连年战争,最终让法国陷入严重的战略透支。国家倾向于根据预期评估面临的选择,采取风险承担行为以规避损失,选择风险规避行为以维护现状收益。^⑥风险规避也可能由于错失良机而蒙受损失,如位于体系中心地带的大国因处于难以独善其身的体系环境或其他强国的“得寸进尺”而导致灾难性效果。^⑦研究窗口理论应立足于风险未知的不确定性分析。崛起国的战略环境评估需要权衡四个彼此相关的要素:一是风险,如威胁增加或丧失权力、地位和领土;二是收益,如威胁减少或权力、地位和领土扩大;三是战略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如考虑威胁方的动机、能力和可信度;四是战略行动失败的可能性,如考虑对立军队的相对实力以及盟友立场的可能转变。在潜在风险比可能收益更高的情况下,如果预期战略行动成功的可能性高于战略失败的概率,那么风险承担仍是可行的选项。从战略心理的角度而言,如果完全失败的可能性足够低,那么即使有可能完全失败,也要追求可能的部分胜利,这需要战略决策者借助经验和直觉来做出明智决策。

(二)影响窗口预期的主要变量

一国参与战略互动的窗口预期仅受到对手国行为的影响,而不受对手国的国内结构或领导人性格的影响,因此考察战略互动层面的变量是首要的,国

内政治过程分析居于从属地位。本文没有将领导人偏好、国内观众成本、战略文化和利益集团压力等国内变量单独列出,而是在保持国家战略同质性的基础上,借助过程追踪法在案例叙事中对国内变量进行辅助说明。变量的选取标准有五点:(1)涵盖物质层面与观念层面;(2)包括历史上大国战略决策的核心关切议题;(3)在战略互动进程中持续发挥影响;(4)涉及理性与非理性因素;(5)综合考虑时间与空间维度。本文认为存在四个影响窗口预期形成的核心变量,即战略动机、地缘政治地位、经济相互依赖和军事攻防平衡。

1. 战略动机

维持现状国家受益于现存模式,对之鼎力支持;修正主义国家在现存模式中处于边缘和不利位置,因此反对延续这一模式。^②更具修正主义动机的国家对现状不满,即使在安全状况相对良好的情况下,也会希望获取更多领土或势力范围。综上所述,战略动机可分为维持现状、有限修正主义和全面修正主义。^③维持现状的战略动机相对不容易诱发风险承担行为,修正主义国家未必要使用武力来达到修正目标。^④维持现状国家主要关心如何保证安全并避免损失,对现状不满的修正主义国家则对如何追求扩张性收益更感兴趣。不安全的国家要比安全的国家更有可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中。愿意承担风险的国家要比规避风险的国家更倾向于加速“行动—反应”过程。崛起国的修正主义可能仅限于特定地区或专属领域,在其他地方和领域则表现得像一个维持现状国家,如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很难确定纳粹德国的修正主义究竟是地区性(征服欧洲)还是全球性(征服世界)的。

本文假设不论是现状偏好还是修正主义偏好的国家都可能受到安全困境影响,这是因为现状偏好不拒绝成本和风险低廉的扩张,修正主义偏好也不排斥权宜之计的维持现状。罗马共和国通常被视为由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主导,但它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安全动机驱动的。^⑤为了制衡哈布斯堡帝国统治全欧洲,瑞典和法国先后介入三十年战争,其首要考虑是战略安全,其次才是霸权利益。霸权守成国的维持现状战略也可能以风险承担的方式实

现,如1914年英国对德宣战。对维持现状的霸权国而言,如果处于不可逆转的衰落中,那么维持现状也可能造成透支风险,这时最合理的是适度的战略收缩;如果寻求有限修正主义的崛起国以渐进的和平方式改变现状,则权力上升可以抵消一部分风险。如果崛起国的战略偏好是全面修正主义,就很可能因安全动机而导致风险承担决心最大化。

当崛起国面临安全脆弱性但相信对手国持有维护安全现状动机时,它采取防御性战略的可能性更大。崛起国关于对手国动机的了解以及主观认为对手国如何了解自己的动机会影响其对外部环境的威胁预期。即使双方都采取进攻性战略,也可能是由意图误判和安全动机驱动。当崛起国的战略动机由修正主义主导时,崛起国愿意承担与其他强国高强度对抗的风险。如果对手国认为崛起国正在寻求修正主义战略,即使崛起国是由安全动机主导,但其他强国出于安全动机或非安全动机,都会更倾向于采取进攻性战略回应,传递恶意信号,进而形成螺旋模式。

其他国家认为崛起国满足安全现状的思维定式会支持其做出使得良性战略关系得以运转的政策。如果基于国家战略信誉和双方互动的历史记忆让一国形成关于对手国动机和意图的思维定式,也会对战略偏好产生影响。无政府状态与权力转移不必然带来安全困境升级,国际体系也并非始终支持冲突性战略。当面临严峻的安全困境时,国家倾向于选择进攻性战略而非防御性战略,而温和的安全困境可以缓解消极的窗口预期,使防御性战略成为一国的最优战略。战略动机会影响实现不同结果的收益认知判断,外部安全形势既会影响实现这些结果的可能性和风险,也会影响它们的价值。

2. 地缘政治地位

无政府状态并不能描述某一历史阶段整个世界的全部图景。近代国际关系史中存在两个大国体系:一个是基于欧洲的,另一个是涵盖世界的。然而,这两个体系的主导权力是重叠的。体系内部的权力基础、权力结构以及大国战略交互影响的方式并不相同,对欧洲大陆体系满意现状的国家不一定满意海洋体系现状,对崛起国的地缘政治诉求应兼

顾全球和地区层面考察。自哥伦布时代以来,海洋体系的无政府特征要远低于均势平衡下的欧洲大陆。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等海上强国的崛起使全球海洋秩序变得更具等级制特征。在近代欧洲大陆地缘格局的演进中,主导性的战略取向是国家结盟反对区域陆权主导国。^③

自希波战争以来,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之间围绕海权与陆权主导地位的争霸贯穿人类历史。^④衡量地缘政治类属身份的重要标准是侧翼大国或中心大国。地缘位置(岛国、边缘地带国家或心脏地带国家)并不能单独决定国家处于侧翼还是中心的战略地位。^⑤尽管历史上的边缘地带强国很容易陷入陆海并举的战略透支,但即使缺乏有利的先天地理位置,如果其他权力中心远离本国,或者盟友众多、对手国制衡能力较弱,也可以判定该国处于优越的侧翼位置。侧翼的战略地位意味着相比中心国家而言有更多的安全盈余和地缘战略方向的单一性,即海主陆从或陆主海从。因此,侧翼位置相比中心地带更不容易发生与多个强国正面交锋的地缘政治情景。^⑥侧翼优势可能受到领土变更或权力转移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英国在传统的欧陆均势体系中被视为海上侧翼强国,但拿破仑将路易斯安那州卖给美国,让美国作为侧翼大国在未来形成对英国的地缘政治威胁。历史上成功崛起的侧翼大国大都既无强敌环伺,又有侧翼位置赋予的决策时间优势,可以在大国竞争中待价而沽甚至后发制人。近海的侧翼地区优于陆上侧翼地区,俄罗斯在基辅罗斯、莫斯科公国、沙皇俄国和苏俄(联)时期,先后受到蒙古金帐汗国、土耳其、波兰、瑞典、法国和德国的军事进攻威胁,需要经过激烈的地缘竞争才能获得稳定的陆权侧翼优势。

陆权崛起国更容易陷入透支风险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陆上强敌环伺,陆权崛起国出于安全动机或修正主义动机会同其他陆上邻国争夺陆地领土;二是为了实现海上霸权国的制衡、推进从陆权到海权的战略转型,陆权崛起国与海上霸权国的军备竞赛、地缘政治对抗以及陆上安全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其资源汲取能力不足,陷入海上战略透支。由于陆地征服的成本高昂,限制了很多强国打破均势

体系的意愿和能力,大陆守成战略往往会选择风险规避。海权国(尤其是岛国)由于水体的阻遏力量、自身海军实力的强大以及离岸平衡手的天然战略地位优势而获得高度的安全感,通常会驱使其选择风险规避。但如果因错误知觉形成消极的窗口预期,就会出现下文讨论的冒险案例。

成功管控透支风险的国家多数起源于侧翼地区。位于中心地带的强国容易面临两线甚至多线作战的地缘政治挤压;侧翼国家在崛起进程中享有更多的时间自主性,将地处侧翼的和平红利转化为对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⑦尽管战略资源、贸易流通、人口优势和市场规模等国家发展要素更多是分布在中心地带而非侧翼地带,但整体而言,侧翼地区更有利于增加战略试错的空间。奥斯曼帝国崛起于安纳托利亚半岛的边缘,但从小亚细亚向东南欧地区的扩张出现了透支。1898年的法绍达危机让法国认识到不能同时与英德两国为敌,这为1904年的英法和解铺平道路,并使其在中心地带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困境。

3. 经济相互依赖

既有的经济冲突、相对收益转化为安全伤害的可能性与意图等因素会影响经济前景预期,具体可分为权宜自由主义与进步自由主义两种类型。^⑧当崛起国偏好进步自由主义而非权宜自由主义的预期,甚至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和市场时,就会强化风险承担的决心。拿破仑认为英国在资源基地、工业增长与国际贸易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将使法国经济长期陷入萧条,因此不惜构建大陆封锁体系瓦解英国的海上主导权优势。如果不消灭英国,法国的经济增长就会被逐渐扼制,使其随时可能遭到英国或俄国的入侵。崛起国单方面对他国经济脆弱性依赖的上升会形成贸易—安全困境。当经济威胁的后果外溢,崛起国不得不在其疆界之外获取重要战略资源时,对资源供给的威胁将成为国家安全问题。经济实力是维持相对地位的重要基础,当崛起国与他国陷入冲突烈度很高的螺旋模式时,相对经济收益的变化会被视为重大安全挑战。当崛起国与他国的战略对抗程度较弱或合作关系升温时,崛起国对相对经济收益的关切就会下降,

对绝对收益的重视程度则会提升。因此,经济相互依赖对国家冲突与合作预期的影响会受到大国战略关系变动的影 响。经济相互依赖既可能成为国家之间强化合作的催化剂,也可能成为敌对关系中威胁伤害对方的政治砝码,经济相互依赖很难直接作用于冲突与合作的选择,而是要通过国家对整体战略安全关系的评估,作为中介变量发挥作用。

崛起国会评估和平贸易在未来潜在的总体预期价值与通过冲突打破贸易互动框架的比值,^④一国对未来贸易前景的预期会导致形成特定的窗口预期,如果怀有相对乐观的贸易前景预估,认为其他强国将长期延续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市场,那么对贸易的窗口预期价值将接近贸易利益本身的实际价值。反之,如果崛起国预计未来的贸易前景有中断或部分脱钩风险,那么贸易的预期价值可能为负,即接近贸易中断的实际损失。^⑤

如果崛起国面对的国际体系环境是贸易保护主义和脱钩盛行的经济紧张局面,崛起国将坚持独立自主,确保贸易渠道多元化,降低本国经济对外部环境的脆弱性依赖程度,确保战略供应、进出口贸易、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不会中断或失去,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与对手国贸易量减少造成的损失。如果对手国认为崛起国敌对意图加剧,则会强化经济遏制决心,更加逼迫崛起国为避免经济地位衰落而采取进攻性军事战略甚至选择战争冒险。^⑥处于对称性相互依赖的双方会更加担忧贸易安全形势的不断恶化,在各方面都比较谨慎,由此产生积极的贸易预期,进而降低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历史上的大国经济关系很少属于对称依赖。

4. 军事攻防平衡

传统军事力量由陆军与海军组成,陆军力量的使用天然比海军力量更有风险,^⑦改变地缘政治形势的程度也更大。军事力量有武力使用、武力威慑和象征政治三种作用。^⑧武力使用看似最容易导致战略透支,但是战略竞争往往从武力威慑和象征政治开始。威慑意味着迫使对手国选择让步,如果对手国的反馈是对抗,就可能导致威慑失败与螺旋模式的出现。象征政治的经典案例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苏冷战的核军备竞赛,核武器数量的激增已经

超过了在地球作战所需,但双方的核力量增长是为了表明不会投降的战略决心并作为政治谈判的工具。探讨军备战略、战术与技术的影响有助于区分进攻与防御的窗口预期。^⑨

军备竞赛是安全困境的关键所在,它使个别国家追求军事安全或军事优势的政策产生了违背初衷的效果。^⑩历史上著名的军备竞赛案例包括1895-1904年日俄军备竞赛、1902-1912年英德军备竞赛、1911-1914年法德军备竞赛、1916-1922年日美英三国军备竞赛、1884-1904年英法俄三国军备竞赛、1922-1930年英美军备竞赛、1938-1939年英德军备竞赛、1957-1969年美苏太空竞赛。^⑪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受威胁的国家会建立针对侵略者的均势,构建一个防御占优的攻守平衡将增加征服难度。^⑫国家有时会因为战略优势有限或损害经济发展而限制防御开支。

如果一国的军事力量正在衰退而经济力量非常强大并处于上升期,仅通过加大军费投入就能够抑制军事力量的下滑趋势,该国就不大可能陷入负面的窗口预期趋势。当进攻占优时,国家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式的扩张和防御性扩张。军事进攻占优具有一种自我约束的效应,它使现状国在反对侵略者方面更加紧密地合作。^⑬现代技术对窗口预期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因为一个武器系统从概念到真正部署需要很长时间,国家不得不在能够了解武器投入使用时的实际军事与政治环境之前做出关于未来军事部署的主要决策。这在冷战以来的军事技术发展和大国博弈模式更新的国际形势下更具参考价值。

军用和民用技术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⑭这种区分难度增加了军备竞赛的烈度和趋势焦虑。大多数军事工具既可用于进攻目的,也可用于防御目的。^⑮任何国家都很难区分其他国家所采取的措施是用于防御还是提高进攻能力,本国通常立足于最坏结果来调整自己的军事措施。军备动力是指国家获得武装力量并改变已有武装力量的数量和质量的所有压力的集合。军备动力可以表现为逐次减弱、保持、竞争(逐次增强)和军备竞赛等不同程度。^⑯保持可以升级为竞赛,而竞赛也可以减弱为保持,即军备发展的正反馈与负反馈可以互相转化。相互预期的“反应”

将军备动力与技术革新的总体过程紧密相连:如果进攻具有支配作用,相对较小的军事衰落就意味着从优势到脆弱的衰退;如果防御具有支配作用,实力对比变化在侵占领土的能力方面产生的变化较小,所以对的政治力量产生的影响也较小;如果一国在潜在的窗口预期中无法知道自身是领先、落后还是与其对手国相等,或者不能确定是否可以通过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来扭转不利局面或扩大优势局面时,国家可能选择“时间贴现(time discounting)”,^⑤使其与对手国的战略博弈从威慑模式转为螺旋模式。^⑥

受攻防区分与攻防对比的影响,大国推进防御性安全战略的概率从大到小的条件依次是:预期进攻与防御战略可区分且防御占优、进攻与防御不可区分且防御占优、进攻与防御可区分且进攻占优、进攻与防御不可区分且进攻占优。成本与持续的时间直接相关,当冲突需要持续很长时间,由于长期的冲突将消耗对手国更大的成本,即使最终胜利被视为可能,威慑依旧有效。

当进攻性武器占据上风时,威慑很可能会失败;当防御性武器占主导地位时,威慑才有可能成功。在危机中,决策者将在预期政治目标的价值与实现这些目标所进行的军事行动的风险和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一个潜在的进攻方愿意承受多大的军事风险直接取决于持续和平所带来的政治代价。风险只能降低而不能完全消除,决策者必须权衡和平的政治风险和冲突升级的军事风险。决策者面临三种截然不同的战略选择,在军事战争中表现为消耗战(attrition)、闪电战(blitzkrieg)和有限目标(limited aims)战略。^⑦崛起国在承担战略透支风险时,通常预期的是闪电战或有限目标战略,但当陷入战略透支时就变成了消耗战逻辑。

(三)因果机制

战略风险的模糊性会使国家很难清楚理解别国的利益和目的,从而使那些不关心他国利害关系的国家由于疏忽大意而升级冲突。战略目标是“行动—反应”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但它给分析与政策行动带来巨大挑战,难以精准区分,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反应通常倾向于最坏打算,可能导致失去宝贵的合

作机会。如果对战略目标的假设过于乐观,对手国可能将和解视为软弱,并寻求利用这种局势以制造冲突。虽然国家可能愿意接受某些让步以达成问题的解决,但是很可能担心对手国不仅不会同样做出让步,反而会因此逼迫自己做出更大让步。在极端情况下,寻求自我安全的国家可能会相信进攻和扩张即使不是实现目标的唯一途径,也是达到目的的最佳方式。窗口预期具有路径依赖效果:行为体在时间 t 表现如何,可能并不取决于其战略技巧与互动模式,而是取决于其在时间 $t-1$ 的位置,这是因为在窗口预期还没有锁定的早期阶段许多可替代选择都是可能的。一旦窗口预期塑造战略进程开始,其结果就是稳定的。^⑧窗口预期的时间维度具有双重特征:既会考虑到对未来的前景预期,也会涉及历史类比经验带来的预期动力。机会窗口是一种正在减弱的进攻性机会,脆弱性窗口是一种正在成长的防御性弱点。^⑨

合作需要为外交创造时间,而窗口迫切需要快速行动。长期窗口产生于均势过程中的缓慢趋势,源于经济增长或军力扩充的不同速度。短期窗口产生于能迅速改变均势的行动,包括军事动员的部署。窗口预期的时段越长,则影响强度越低;时段越短,则影响强度越高。相对长期窗口而言,短期窗口预期要求决策者在有限时间内进行压力决策。崛起国应对透支风险的主要措施是大战略调整,包括微观的危机决策与外交决策以及由此引发的体系结果和系统变迁。当崛起国发现未来行动要比当下行动面临的透支风险更高时,就可能因“两害相权取其轻”增加风险承担的决心。

消极窗口预期是指形成长期—脆弱性窗口与短期—机会窗口的判断。消极窗口预期可能导致安全困境失灵,国家陷入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预期的反馈模式,逐渐从不确定意图到确定彼此的修正主义意图并将敌意合理化,导致螺旋模式占据主导地位。此外还有三种程度不同的积极窗口预期:第一,当长期—机会窗口与短期—脆弱性窗口预期占主导地位时,国家倾向于维持现状,等待未来时机。这使得安全困境发挥作用,国家间的这种困境由于第三方因素等擦枪走火的偶发性事件或者长期对抗从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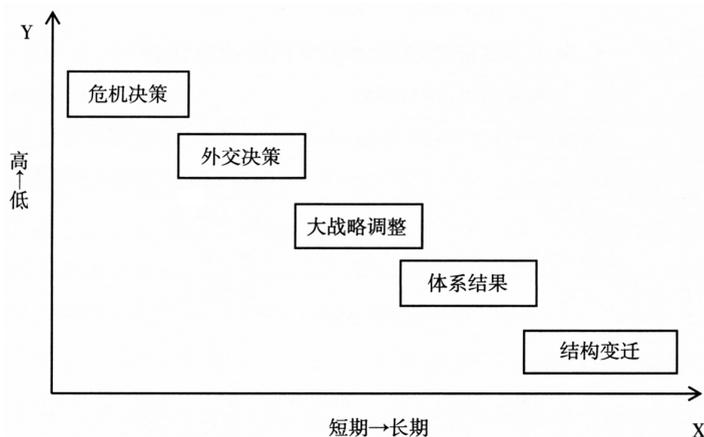


图1 窗口预期的时段与影响强度的关联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X轴表示窗口预期的时段,Y轴表示窗口预期的影响强度。

烈度进入高烈度(国际危机和战争等),最终可能形成安全困境模式下的风险承担或风险规避。第二,当形成长期—脆弱性窗口预期且没有短期—机会窗口时,国家会选择维持现状。这使得安全困境的影响强度下降,国家倾向于选择风险规避。第三,当长期—机会窗口预期生成且没有短期—脆弱性窗口预期时,国家受到安全困境的影响最小,国家风险承担的决心与透支结果的出现可能性较低。综上,当预期积极窗口呈扩大趋势时,国家以接受现有国际环境和承认现状作为期望值,从而选择风险规避;当预期消极窗口呈扩大趋势,国家以塑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和修正主义偏好作为期望值,从而选择风险承担。

当战略动机是修正主义而非维持现状、对地缘政治地位和经济相互依赖上存在悲观预期、军事上形成有利于进攻的乐观主义时,国家将强化风险承担决心。当出现变量作用方向不一致的情况时,本

文认为,战略动机是先验给定的,在时间上先于其他变量而存在,本身不容易发生变化。其他三个变量是并列存在的,可能强化也可能弱化原有战略动机的实际影响。维持现状可能采取进攻性战略,修正主义国家也不一定排斥防御性战略(如形势不利时的权宜之计)。安全、利益、荣誉和复仇等战略动机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对其他三个变量发挥基础性影响但不起决定性作用。地缘政治地位是主导性中间变量,能决定窗口预期的大致方向。军事攻防平衡的作用效果低于地缘政治地位,但要高于经济相互依赖。如俾斯麦时期,德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担忧程度较低、满足大陆守成现状且认为军事上防御占优,即使存在悲观的贸易预期及德国海军的劣势地位,也不会改变其相对积极的窗口预期。如果发生经济相互依存、军事攻防变量的逆向作用机制时,崛起国风险承担决心与战略对抗烈度将受到

表1 积极窗口与消极窗口的战略比较

| 窗口预期 | 积极窗口(风险规避) | 消极窗口(风险承担) |
|-----------|--------------|--------------|
| 战略意图 | 对维持现状的重视程度较高 | 对修正主义的重视程度较高 |
| 不安全感 | 较低 | 较高 |
| 战略互动预期 | 威慑模式 | 螺旋模式 |
| 军事战略 | 防御性 | 进攻性 |
| 对待困难任务的态度 | 憎恶 | 愿意接受 |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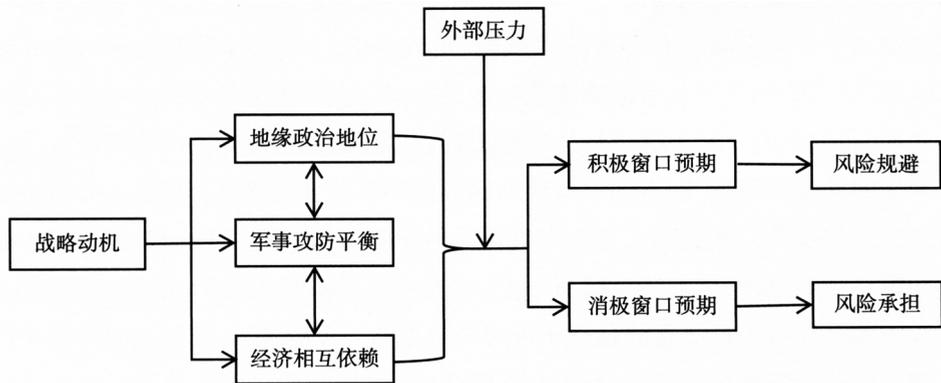


图2 窗口预期的因果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影响。

(四)窗口预期与战略透支风险的关联性分析

窗口预期带来的风险规避/风险承担选项与战略透支既有联系也有重要区别。风险规避有助于国家减少战略透支风险,但并不必然导致成功的战略行动;反之,战略透支结果也未必是由风险承担引起的。关于窗口预期对战略互动进程的作用应充分考虑到系统效应,尤其是间接、中介性和滞后的效应。两个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常常取决于它们各自与他者的关系,互动具有核心的重要性,人们不能通过相加的操作(additive operations)来理解互动。结果无法从孤立的行为中预测出来,己方的战略依赖于他者的战略,行为体的行为会改变系统环境,许多结果是非故意的,并不随意图而来。^⑤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的风险接受与后来对日战争的透支行为一脉相承,而威廉二世的战略冒险为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战略提供了历史参照。

应对战略透支的风险承担行为要考虑到历史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窗口预期除了考察双边战略互动外,还涉及第三方因素,即崛起国是否缺乏可替代性选择。国家之间讨价还价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自可替代性选择的多寡以及不同选择的成本与收益权重。替代性选择会受到每一方与第三方的关系现状和通过战略技巧可以达成的潜在关系的影响,缺少替代性选择的崛起国会因为代偿不足提升风险承担决心。如果以战略透支后果是否出现作为判定风险规避/风险承担是否发生的标准,就会把许多已经发生的风​​险规避/风险承担行为排除在考察

范围之外。

在行为体有意识地对其他行为体做出反应并预测它们认为其他行为体行为之际,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互动就发生了。行为体很难评估自身战略对他者战略的敏感程度和调整能力。一国在战略互动中发挥影响,首先是通过战略行为影响他国的战略观念,让对方的战略观念转化为战略决策与战略行动,进而对方发出的战略行动对己方产生正面/负面影响。崛起国进行战略输出时,应注意到本国的窗口预期与对手国的窗口预期的共变性特征,即本国窗口预期的形成和影响会在多大程度上引发对手国原有窗口预期的变化。崛起国在消极窗口预期的影响下采取的战略行动很可能压缩对手国的窗口预期范围,增加体系制衡压力,缩短崛起的战略机遇期;在多轮博弈中,本国持续的不合作行为和敌意的合理化可能导致战略信誉的透支,增加未来外交妥协的成本和风险。希特勒判断出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奉行孤立主义和不愿介入欧洲大陆安全事务的意图,但忽视了自身的战略扩张会改变美国的窗口预期。由窗口引发的透支风险通过缩小窗口而减小,也可以通过约束对冒险的预期来减小,一些悲观的窗口预期通常是夸大事实甚至是虚幻的。

崛起国的窗口预期一旦形成,在战略实践过程中就会影响对手国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中的窗口预期。窗口预期的作用机制在本质上由战略互动双方共同缔造。崛起国如果形成时间紧迫、空间有限的短期一脆弱性窗口预期时,也会压缩对手国的窗口

预期弹性,形成时间位差。如要避免或缓解位差效应,就可能需要风险规避或对透支趋势的及时止损。当出现损失厌恶的窗口预期时,崛起国选择风险承担,意味着消极窗口预期产生了沉没成本、夸大威慑效果和“托克维尔悖论”^③的共同作用机制。

沉没成本是指由于过去的决策已经发生了,而不能由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决策改变的成本。^④即使边际收益日渐减少,国家对沉没成本的考量仍然优先于边际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军备及人员投入和战时经济运转等)。尽管可能失败,崛起国为了证明前期战略投资的合理性,甚至会形成战略偏执继续升级前期的行为步骤。这种承诺升级意味着决策者持续地投入所需资源,为了挽回沉没成本(包括物质成本和声誉)选择风险承担,尽管在这一进程中面临巨大的困难并且持续投入的前景不容乐观。

夸大威慑效果是指在安全困境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体系中,崛起国倾向于将对手国的妥协让步视为己方威慑的成功,而非解读为真诚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战略示善诉求。上一次的威慑成功会让崛起国在下一轮的博弈中更加具有进攻性,对手国也会因为蒙羞或及时止损而拒绝妥协,这会让战略互动的双方都认为对手国采取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战略逻辑。^⑤

“托克维尔悖论”是指当国家外部战略环境好转,崛起国出现安全盈余时,会激发对未来更好前景的期望;但当战略地位的实际提升速度赶不上预期效果时,就可能对现状不满。崛起国真实或虚幻地认为本国当前行动的环境是最优的(未来会变坏),认为稍微降低安全系数选择风险承担挽回此前损失,从而避免未来进一步受损也是可以接受的合理选择。

窗口预期对国家应对战略透支风险的影响主要会形成“修昔底德陷阱”和“奥古斯都门槛”两种大国政治的悲喜剧效果。“修昔底德陷阱”包括“崛起国综合征”与“守成国综合征”。^⑥由于崛起国与其他强国存在权力的不平衡增长未必始终有利于自身,且联盟的分化组合、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瞬息万变,一个崛起国可能同时具备这两种“综合征”:相对于正在衰落的霸权国而言,出现崛起国综合征;相对于崛起更

快的国家而言,生成守成国综合征。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后,会出现战略资源透支、战略机遇期透支和战略信誉透支三重风险。资源透支主要是目标过高、手段不足;^⑦机遇期透支是指让体系制衡压力提前到来并不断升级;^⑧信誉透支是指外交谈判代价过高、承诺缺乏可信性。^⑨“奥古斯都门槛”最初是指罗马帝国自盖维斯·屋大维·奥古斯都(Gaius Octavius Augustus)起摆脱了盲目扩张阶段、避免了帝国内部自耗、迎来了长期稳定的至少持续两个世纪的上升阶段,^⑩即崛起国化解了战略透支风险,实现了长时段的稳定崛起。当崛起国与其他强国的互动模式是螺旋冲突上升,同时窗口预期产生了沉没成本、夸大威慑效果和“托克维尔悖论”时,就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当互动模式由威慑逻辑主导,并且上述三种效应被缓解或规避时,就能降低风险承担概率,跨越“奥古斯都门槛”。

四、案例分析

为了实现对窗口预期理论的有效案例检验,本文选取的日本和德国案例满足如下标准:第一,在仍然从体系现状中获益的情形下,选择从风险规避转向风险承担,既有积极窗口也有消极窗口的案例表现。第二,地缘政治特征的多样性,涵盖海洋性国家与大陆性国家。第三,在应对战略透支风险时都有及时止损的客观条件,但却因窗口预期的变化,冒着牺牲既得利益的风险强行进攻。第四,从积极窗口预期到消极窗口预期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案例分析应适合过程追踪法。

(一)日本(1894-1941年)

从“黑船事件”到美西战争是日美关系的“蜜月期”,但随着美国推出“门户开放”政策及其深度介入东亚地缘政治,日美冲突逐渐加剧。日本挑战美国东亚政策换来了美国持续增强对日制衡意愿(从“不承认主义”到石油禁运),双方的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最终引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在1936年年初谈判破裂之后的军力扩张威胁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⑪日本是以军事崛起带动经济崛起,美国是以经济崛起带动军事崛起。两国的侧重点有本质区别,美国对国际秩序的构想是“门户开放”,而日本是非他性的“大东亚共荣圈”。

1. 风险规避与日本的有限扩张

日本在军部法西斯势力崛起以前,不乏风险承担行为,但在战争风险与高昂的军备竞赛面前,以保存扩张性收益为底线,仍有起码的战略理性。即使看到日美实力差距难以逆转,日本也没有选择预防性战争,而是风险规避。这既有日本自身的窗口预期动因作用,也与美国对日战略的相对温和有关。但日美两国在军事对抗与危机化解过程中,也生成了对彼此的更多负面预期,并在20世纪30年代集中爆发。

首先,日本在甲午战争至币原外交这段时期怀抱有限的修正主义战略动机。以佐藤信渊(Sato Nobuhiro)推出的《宇内混同秘策》为代表,日本开始寻求类似美国的门罗主义。^①美国尽管拆解了英日同盟并制订了对日作战的“彩虹计划”,但整体上缺乏在东亚以武力阻止日本扩张的决心。日本寻求权力扩张来满足安全需要,在20世纪30年代前相对注重战略克制。美国对亚洲地区的态度是防御性现实主义战略逻辑,通过华盛顿会议限制了日本在东亚大陆的扩张和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军备竞赛。

其次,日本对地缘政治地位的追求以不损害既得利益和战略安全为底线。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第一次战略冒险,当时佐藤铁太郎(Sato Tetsutar)和铃木贯太郎(Suzuki Kantaro)等海军军官都担忧与中国开战的毁灭性后果。^②战争的胜利让日本进一步卷入了与列强在东亚地区的地缘对抗。美国对东亚的介入力度直接影响了日本方面的战略判断。面对日美两国在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层面的冲突因素,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通过“日美君子协定”、大白舰队对日本展开的海军外交和《高平—罗脱协定》加以平衡解决。^③日本既是抵御陆权威胁的缓冲与平衡力量,又是阻碍美国介入东亚的均势力量。华盛顿会议赋予了日本西太平洋的制海权,缓解了日本沿海地区缺乏缓冲国的困境。^④

再次,日本通过合作加强相互依赖,影响对手国的窗口判断。日俄战争的冒险没有使日本战后对俄野心进一步扩大,反而开创了两国合作的时代。1907年日俄缔结航海通商条约,又签订条约尊重对手国领土完整和在中国东北“门户开放”原则。^⑤20

世纪20年代的日本迎来了以政党内阁和协调外交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和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在威尔逊主义之后的战略收缩和对国际安全预期的变化减少了日本窗口预期面临的紧迫性。原敬内阁开启了对美协调外交,标志是1920年确立的新四国银行团。1928年的“野村报告”指出:美国不大可能阻碍日本和平进军中国的企图,否认了经济决定论视阈下的日美必战论,这与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Shidehara Kijuro)的方针完全一致。^⑥

最后,日本认为军备竞赛获胜的窗口渺茫,只有用国际条约控制日美军备发展进程,才能规避战略透支风险。英日同盟让日本可以选择放缓海军扩建速度。但此后的战争和危机让日本逐渐透支国力,1921年日本海军开支耗费了33%的国家预算。^⑦虽然此时日本可生产在技术上与美英造船厂相匹敌的军舰,但在数量上难以追赶。日本战略界的谨慎战略观念认为:如果追求和实现海军扩军目标最终导致与美国无限制海军军备竞赛,那么扩军永远不可能给日本带来战略安全。^⑧日本试图开展“八八舰队”计划与美国争霸,^⑨但1914年巴拿马运河的开通改变了日美两国的军事攻防对比,美国两洋战略的联通减少了对日作战的地理距离障碍。^⑩华盛顿体系有效地用一种同时提高美国和日本安全感的方法代替了“安全困境”与零和博弈。^⑪日美两国在新条约的限制下都无力在太平洋地区发动一场跨洋攻势。加藤友三郎(Kato Tomosaburo)放弃了1907年《帝国国防方针》的三项指导原则:70%的比例、“八八舰队”和把美国作为假想敌。^⑫1927年的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由于英美对立导致无果而终。1930年的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使日美关系达到了顶峰。^⑬

2. 日本选择风险承担与过度扩张

自1921年以来,西太平洋的战略局面已经因为空中力量的发展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代海权需要仰赖制空权。苏德战争的爆发为日本向北扩张提供了可能性,但日本准备坐等苏联在欧洲彻底被击败后再征服西伯利亚,选择了南下扩张。^⑭

第一,近代日本扩张的战略动机包括对来自东亚大陆和西方列强的威胁认知及“脱亚入欧”的使命感。探究日本的安全战略传统,可以追溯至1890年

的山县有朋(Yamagata Aritomo)的意见书,他提出了“主权线”与“利益线”的概念,分析大陆国家对日本安全保障的影响,为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提供了理论准备,^⑧促进了日本大陆帝国方向的地缘政治扩张步伐。^⑨日本对西方维持现状大国充满了敌意,试图获取更高的国际地位来提升帝国荣耀。日本自视为防御性的战略行为导致的非本意和不理性的后果构成了日美两国深度陷入的安全困境。在日本看来,无论是中国的朝贡体系、英国的海洋霸权秩序、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还是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和东进运动带来的陆权秩序,如果屈从于其中任何一种权威都会违背其安全诉求。^⑩

第二,日本能够发动局部地缘扩张,但又缺少独立打破国际体系和秩序现状的能力。美国维护在东亚地区的扩展性安全利益,被日本越发解读为威胁自身在东亚的扩张性帝国地位。1940年法国沦陷和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为日本入侵东南亚和大洋洲创造了机会。^⑪日本将很多不切实际的战略预期寄希望于德意两国的成功。^⑫日本与英国有着类似的地理位置和地缘特征,^⑬但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地缘大战略。在战略思想层面,日本学习美国的马汉式海权思想与实践,但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水体阻遏力量和充沛资源可以赋予它更多的战略试错空间,而日本迷信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提倡的大舰巨炮和舰队决战,忽视了自身的资源禀赋劣势。来自苏联的地缘威胁、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经济大萧条推动日本从20世纪20年代的战略保守主义转向对外推行军国主义,日本试图通过对中国东北的占领阻断欧亚大陆通往日本战略通道。在战略计划层面,1907年、1918年和1923年三个版本的《帝国国防方针》逐渐将美国树立为头号假想敌并同时提出要制衡中俄。^⑭在战略行动层面,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不乏陆主海从的战略取向传统,多数日本人无论是从种族、心理还是文化上都对欧亚大陆有一种归属感。相比纽约和华盛顿,莫斯科和柏林距日本更近。^⑮这也让日本在优先对美还是对苏作战的战略选择中犹豫不决。

第三,日本的海军至上主义者从马汉的经济和贸易理论中推断出一种经济决定论,即美国在强大

海军支持下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将会导致日美之间的战争,这成了日本海军界的一个信条。^⑯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出口需求,强化了日本的贸易利益,使日本认为自由贸易比军事扩张更为有利可图。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贸易壁垒使贸易水平下降,日本修正主义的动机不再受到理性约束。当大萧条及相伴而生的保护主义使国际环境不再适于采取自由主义政策时,秉持风险规避、战略克制的大正时代就让位于军国主义国家化。日本吸收了很多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理念,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日本向德国学习“大空间经济”的结果。^⑰山本五十六(Yamamoto Isoroku)对日美实力差距有着清醒的认知:“任何见过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得克萨斯的油田的人都知道,日本缺乏与美国进行海军竞赛的国力。”^⑱山本五十六等人明知与美国的地缘竞争尤其是战争完全没有胜算,但仍然选择冒险。其背后存在经济方面特别是日本海军对舰队和飞机可能的油料短缺的担忧,当时日本80%的石油、90%的汽油和70%的铁矿砂需要从美国进口。^⑲这足以说明短期一脆弱性窗口预期的影响程度有多深。

第四,日本认为长期的军事攻防对比趋势有利于美国,又对日本主动进攻的短期优势抱有赌徒心态。美国海军少将威廉·本森(William S. Benson)指出:“除了美国,日本在太平洋没有其他对手国,日本建造或获得的每一艘战舰,都是有意地对抗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⑳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本内务大臣末次信正(Suetsugu Nobumasa)说,珍珠港大屠杀源自华盛顿会议。^㉑日美之间最终陷入海上安全困境的螺旋模式,日本认为美国维护“门户开放”政策的海军威胁到了自身利益;反之,美国认为日本有一支足够保卫自己并推行其国策的海军是对菲律宾和远东其他国家利益的威胁。^㉒随着军事航空技术的进步以及美国在太平洋海军基地的稳固,日本海军越发不满华盛顿会议的主力舰吨位比例限制,退出了《海军军备限制条约》,着手打造强大的舰队,建造“大和”战列舰。

3. 被夸大的短期一机会窗口与长期一脆弱性窗口

过去的胜利助长了日本以战养战的乐观预期,

同时强调如果日本进行战略收缩,会让其他国家在未来对日本采取更为进攻性的姿态。日本的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相对缓和所反映的并非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而是对较坚决策略之代价和风险的冷静估计。^⑤一系列历史教训让日本精英认识到国际政治实质上是一场零和性的军事竞争,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和战术可以取得收益,谋求合作则无法获益。日本自身所经历的美英炮舰外交、对中俄战争的获胜以及与20年代币原外交的失败相联系的经济大萧条等都影响了日本的窗口预期。日本政府是在窗口要求迅速做出决定的压力下来考虑决策的。鹰派赞同预防性战争,认为日本存在短暂的巨大机会,如果不采取行动在今后会由于脆弱性上升承担更大风险。

德国发动在欧洲的战争后,日本的主流决策认知是确信轴心国之间的军事联盟能够阻止美国介入亚洲事务。日本对美作战目标是通过速战速决实现政治和谈、结束战争,这低估了美国的抵抗决心。^⑥日本难以通过高明的战术弥补战略失误以及与美国巨大的实力差距:1938年6月,美国实施了航空物资出口的“道义禁运”;1939年,《美日商务条约》被废除;1941年7月,日本夺取法属印度支那后,美、英、荷三国联合实施了对日石油和铁矿禁运,在日本看来只有不惜与美国开战才有可能换来经济安全。但美国人口近乎日本人口的两倍,每年的国民收入是日本的17倍,钢产量是日本的5倍,煤产量是日本的7倍,机动车产量是日本的80倍,工业潜力是日本的7-10倍。^⑦

虽然1930年英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已经威胁到日本的经济安全,但“苏联优先”的认知判断不在少数。日本一直在为对苏作战准备,“诺门坎事件”和“张鼓峰事件”都是日本挑衅苏联的依据,德日强化军事合作后,日本也是以“北进”为首要目标并希望能够以渐进和平的方式对东南亚进行经济渗透。日本认为针对美国的目标是威慑而非战争,加强海军可以避免美国干涉日本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只有在威慑失败、美国政府抵制日本向南经济渗透的情况下才能诉诸战争手段。但日本却因为战争范围的扩大陷入了愈发长期的脆弱性窗口预期:侵

华战争→资源消耗巨大→加深日本对美脆弱性经济依赖与美国升级经济制裁门槛→日本形成悲观前景预期→对美国敌意的合理化→日本对美作战的风险承担决心提升。^⑧最终日本将原本对苏进攻和对美威慑的战略进行了对调。

4. 日美关系:从威慑模式到螺旋冲突升级

从1940年年初到1941年年中,最努力推动军事南进(目的是军事占领,而不仅仅是投射海军力量、支持经济渗透)的不是海军,而是陆军。^⑨向南扩张可以获取对苏开战的原料,还可以截断对中国的援助通道。珍珠港事件前夕,由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石油禁运,南洋地区的石油资源对日本格外重要,加上日本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共同在背后推动了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的发生。^⑩日本自身所经历的“黑船事件”、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海军事备控制、币原外交和经济大萧条等事件中的损失和收益认知塑造了脆弱性窗口预期,让日本精英认识到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和战术可以获得收益或及时止损(未来行动只会比现在承担更大透支风险),谋求合作则无法获益,这种悲观预期也导致美国对日本形成了类似的预期认知,产生时间位差。

在沉没成本方面,日本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已经通过前期成本投入取得了规模巨大的扩张性收益,不会轻易放弃。日本走向过度扩张大战略的主要转折点出现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此时日本帝国战略的成本还未完全超过收益。随着日本在军事上陷入中国不能自拔,在经济上因重点发展重工业而对轻工业和出口导向部门造成了损害,日本推行自给自足的帝国战略的成本才超过收益。作为严重衰退国家,日本担心美国的军备扩张使日美力量对比变得对自身越来越不利。日本在1941年发觉了一个巨大的窗口:第一,暂时获得了对美国的军事优势。第二,发生在欧洲战争带来的外交良机。第三,美国对日石油禁运。第四,冬季进攻可避免苏联在北方发动进攻。第五,美国迟早对日开战。日本在可能衰落的主动冒险战争与必然走向衰落的趋势焦虑中选择了前者。^⑪

在夸大实力威慑效果方面,1940-1941年窗口的出现使日本的行为发生了巨大转变,日本从有限的

地区性侵略政策转向全球性的针对美英的战争。对历史的类比记忆让过去的事件也构成了窗口预期的要素,如对马海战创造出“一种让日本领导人在40年时间里无法忘怀的神话,或许没有哪个国家能战胜日本海军,即使英国和美国也不行”的观念。^⑥日本误判了双方的窗口预期,在偷袭珍珠港时假设了美国不情愿在亚太地区陷入长期消耗战的乐观窗口预期,甚至认为美国最终会主动与日本寻求妥协。

在“托克维尔悖论”方面,日本对华盛顿体系建立后开始好转的安全现状不满,并开始以降低自身安全系数的方式展现更多的进攻性战略,随着在东亚大陆扩张性收益的激增和资源消耗,累积的沉没成本让日本不愿以战略克制作为与美国修好的条件。日美作为两个崛起大国,相对英国而言实力都在上升,真正招致日本挑战美国的根源是日本消极窗口预期不断扩大:日美之间始终存在不利于日本的权力转移趋势。随着美国对东亚地区远距离投送能力与日俱增,日本看到暂时获胜的机会窗口正在缩小,但日本对美国的高度经济依赖和脆弱性窗口越来越大。在发现无法通过和平渠道让美国放弃对东亚主导权的介入后,日本选择了风险承担而非风险规避来处理日美关系。如果日本在1937年不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或在1941年不发动太平洋战争,抑或半年后看到德国由盛转衰的话,日美战争很有可能避免。那么日本也许可以提早几十年实现它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达成的超过英国制造业和工业产量的目标。

(二)德国(1871-1914年)

俾斯麦德国是一个满意现状的国家,通过有限的殖民扩张、放弃海洋帝国及构建大陆联盟体系等因素巩固并扩大了德国的上升势头。但在后俾斯麦时代,德国一方面渴望成为世界强国和海洋强国,另一方面通过“风险舰队”理论表明对身为大陆国家的心满意足。不论德国是否有称霸意图,只要其实力稳定增长,就会不断满足野心,甚至根本不需要“恶意预谋”就会成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一种可怕威胁”。^⑦这必然会引起其他大国的制衡和围堵,体现了“修昔底德陷阱”对权力转移引发战争的冲突逻辑。

1. 俾斯麦德国的积极窗口预期与风险规避

首先,德国在1871-1883年殖民扩张以前以维持现状作为主导性战略动机,在1884-1890年是以陆上安全为主的有限修正主义国家。此时德国的战略认知是:(1)不应在欧洲追求进一步的领土扩张,应满足1871年成果;(2)无论是武力还是和平方式,都会加剧德国国内民族和宗教问题以及离心倾向。即便己方认为对外强硬举动只是防御性的,也会招致其他强国的制衡,若德国推行扩张会为法国复仇和寻求盟友提供良机。

其次,德国在大国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关切是其对外政策的首要出发点,也是决定其如何看待他国国内政治变迁的决定性因素。^⑧俾斯麦认可军事力量是衡量德国重要性的真正标准,但不希望新的战争危及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成果。^⑨1875年的“战争在望”危机,由于英俄两国的强硬干涉,俾斯麦不得不暂时放弃进攻法国的计划。俾斯麦担心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为此他通过1873年三皇同盟、1877年《基辛根备忘录》对沙俄与奥匈的战略关切、1879年德奥军事同盟、1882年德奥意三国同盟及1887年德俄“再保险条约”等外交手段,阻止俄法接近、调控俄奥矛盾并拉拢奥匈帝国,加剧英俄在世界各地的对抗。为巩固欧洲大陆地位,俾斯麦在殖民地问题上比较谨慎,不愿与英国发生冲突。^⑩这一时期,德国五个互相关联的地缘战略目标:(1)通过巩固而非扩张保证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半主导地位;(2)孤立法国;(3)保障奥匈帝国的未来大国地位;(4)保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5)避免德国被孤立。^⑪到1890年俾斯麦下台前,德国与除法国之外的其他欧洲大国的矛盾小于这些大国相互间的矛盾,其他大国间的矛盾也未曾出现对德不利的战争风险。

再次,俾斯麦意识到殖民地有助于德国成为一个海上强国,^⑫但没有让殖民地的利益威胁到德国经营的欧洲大陆地缘辖区。^⑬19世纪80年代,法国人的对德复仇欲望总体上趋于减弱,法国经济发展和对外相互依赖的增强使得农业界、金融界和贸易界都成了反战力量。德国相对于法国趋于拉大的国力优势尤其是工业和军事优势(后者的一大基础是德国不断增长的人口优势)、法国身边缺少强大盟友、

英法矛盾的上升(尤其是围绕埃及问题)、德国的怀柔政策以及对德温和派在法国政权中的优势都让德国确信经济相互依赖短期内不会形成对战略安全的负面溢出效应。

最后,英德两国相互建构积极的窗口预期,孤立法国和拉拢俄奥让德国的军事安全担忧得到缓解。英德都是在欧洲大陆维持现状的大国,英国避免在战争危险并不严重时结盟。英国也有积极的窗口预期:普法战争削弱了法国实力,德国海军仍然弱小,欧洲大陆大国主要聚焦陆上武器装备,美国关注南北战争后的重建。英国海军优势进一步提升,舰队费用却不增反降。英国这种廉价海上霸权贯穿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始终。法俄等国都在挑战英国赖以生存的欧洲大陆均势与海洋霸权体系,德国海权战略的克制与大陆联盟体系的构建使其得以避免海军与陆军的军备竞赛,获得了安全盈余的崛起红利。法国的军事准备主要是为了应对德国可能发动的进攻,而非主动去进攻德国;法国军方未制订对德进攻计划,士兵服役期在1889年从5年减为3年。俾斯麦并不担心法国会单枪匹马进攻德国。德国声称与奥匈帝国的同盟是防御性的,避免承担联盟牵连的风险。

2. 德国选择风险承担与过度扩张

海军军备竞赛开始之后,威廉二世相信如果英国放慢海军建设,那一定是其经济实力到了无法支撑扩军的地步。施利芬计划的实质就是把采取进攻战略和两线作战的必要性结合起来。一旦法国和俄国签订军事协议,德国很可能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该计划不重视战争的政治后果,而是强调卢森堡、比利时与荷兰的中立地位必须打破,没有考虑英国对这三个国家的利益。如果受到威胁的国家认为施加威胁的国家具有高度的侵略性,那么军备竞赛和敌对行为的典型螺旋模式就会被启动。从德国方面看,英国支持法国就是伤害了德国的利益,即使增加军备不能使英国的态度缓和下来,至少可以使德国做好准备,以便对付即将到来的战争。

第一,1891-1896年德国是以追求陆上安全为主的有限修正主义国家,而在1897-1914年德国推行了陆海并举的全面修正主义政策。俾斯麦的大陆联

盟体系和站在多数一方的均势制衡战略逻辑不仅没有得到继承,^⑩而且对俾斯麦时代的战略误解也助长了德国的错误知觉。德国此前在俾斯麦时代已经尝到了采取强硬威慑态度制止对手国却没有导致非本意和不理想后果的甜头,如1877年和1885-1887年两次处理巴尔干危机分别挫败了俄国和法国的扩张举动。这种有所曲解的历史类比塑造了德国面对国际危机的战争边缘政策,进而加剧了其他强国对德国的安全恐慌。

第二,德国的地缘政治诉求是大陆主义的海上战略扩张。德国从来没有对英国的战略地位构成过威胁,反而由于地理位置不利受到了英国战略上的强制。^⑪对英国主动进攻的设想源于德国的陆权战略传统,但英国不需要攻占新的战略据点来获取制海权和保护本国的海上商道,所以从一开始便呈现出对战略防御的偏好并且不会因为英德海军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变化。故“较强一方必须采取战略性进攻”这一原则并不总是适用于海战,德国高估了英国必须主动进攻的脆弱性窗口预期。

第三,对脆弱性经济依赖的担忧催生了德国的帝国主义战略思维与经济政策,倾向于接受战争风险。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为代表的德意志帝国主义的理论学说为德国形成经济领域的脆弱性窗口提供了思想来源,提出铁路对军事力量对比有巨大影响。他的思想经过转化和演进(尽管不少是歪曲),体现为俾斯麦的大陆联盟体系、“3B铁路”计划、殖民扩张、英德海军竞赛、泛日耳曼主义、纳粹主义、生存空间和对苏联作战的“巴巴罗萨计划”等。^⑫德国工业界、贸易界和金融界的经济活动都有很强的跨国性质,体现了对海外经济利益的更多需求。美国、俄国等国快速工业化让德国担心经济竞争压力,德国的海外贸易容易遭到海上封锁;当时除了英国之外的其他大国都在国际上更偏好重商主义,甚至英国也奉行了某种帝国保护主义;其他大国未必会和平地坐等德国获得经济霸权,甚至已经采取了反制措施。^⑬自1906年以来,德国政府担心如果粮食进口中断,该如何保证民众免于饥饿。^⑭

第四,对进攻有利的窗口误判。尽管德国军事家承认新型武器在战术层面上的防御主导效果,但

德国仍然形成了短期的进攻机会窗口预期,认为通过战术和战略创新能形成进攻占优的局面。战术层面上的防御占优会增加战争的难度和参战国的成本,但绝不会使发动战争在军事上变得不可能。^⑩德国参谋本部在1912年以后的集体战略迷思是战争来得越早越好。^⑪1914年德国在陆军的机动速度上有质的优势,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对手国所拥有的军队数量优势。挑衅与过火反应的周期不断升级,导致这一安全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这种不平衡。“施利芬计划”要求的是陆军的绝对进攻,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的“风险舰队”理论却假设德国陆上安全形势较好且只需要与英国开展海军竞争。在该时期,海洋开始变成一个新的战略领域,工业革命和科技发展对战略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⑫

3. 虚幻的短期—机会窗口和长期—脆弱性窗口

英国把德国海军的扩建视为对海上霸权地位和欧洲大陆均势的威胁,英国做出的反应是加快自身海军建设的速度,这导致两国海军军备竞赛持续升级。自1889年以来,英国的海军建设一直明确以“两强标准”为统领,即英国的海军必须比另外两个海上强国的舰队加在一起更强大。提尔皮茨的战略计划则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德国海军将扩大到相当规模以致英国海军将长久面对与德国海军发生冲突的风险,后者可以重创英国海军舰队。即使英国在海战中打赢了,剩下的海上力量也将非常薄弱,不足以对付其他主要海上强国的海军。^⑬提尔皮茨的“风险舰队”理论缺乏战略性进攻以及追求海洋权力和给对手国制造风险的决心。

当国家缺乏战略意图和追求海洋权力的决心时,德国的舰队对英国就不构成威胁。英德两国分别在1906年、1908年、1909—1910年、1911年以及1912年为达成普遍共识而谈判,试图确立一份关于限制海军建设的协议。海军扩建本身不是英德冲突的关键,而是德国坚持通过海军军备控制谈判获得有形回报,即德国与一个大陆强国开战时,英国必须坚守中立承诺。英国在海军竞赛中本就处于优势,不愿为已经获得的权力地位而向德国做出限定性承诺。即使没有威廉二世掌权,德国也极有可能奉行

一种颇具野心的海军建设政策。德国在1897年占领中国胶州湾,打造德国在中国长江流域从事商业活动的基础,英国开始感受到德国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威胁。^⑭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海军至少两次推迟了发动战争的时间。德国决策层认识到,与法俄作战的同时必须至少能够防止英国支援欧洲大陆。^⑮由于俄国的巨大潜在力量正在迅速转为真正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德国要想保证自己的长期安全就应尽快行动。在1912—1913年,德国战略决策层形成了短期窗口预期,认为要获得霸权就必须尽早打一场预防性战争。英国要求德国停止造舰并试图与德国达成某种谅解,但最终理查德·哈尔丹(Richard Hal-dane)访德失败。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英国不愿签订保持中立的协定,因为这会限制它协助法国的自由;二是德国不愿对补充海军法案做出任何重大的可以使英国满意的削减。哈尔丹访德就像1910年德俄在波茨坦的谈判一样,消除了某些摩擦的根源,但是既没有达成某种成文协定,也没有改善德国的政治孤立。^⑯

德国的虚幻窗口预期带来的风险承担行动既在时间上加速了其他列强对德国的威胁认知,也在空间上让英国只能从全球实行战略收缩拱卫北海安全,导致法俄放弃了海外殖民冲突将欧洲大陆作为地缘对抗中心。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双重压缩形成了互动双方窗口预期的位差效应。^⑰1912年4月,英法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海军协议,英国海军将负责英吉利海峡的安全,法国舰队将集中地中海。^⑱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危机期间,德国认为仍然有机会让英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因为英法俄的协约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固的联盟。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认为英德友好关系是可能的,避免重大危机是值得的。^⑲

4. 德国威慑失败与螺旋冲突升级

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的先入之见是:英法、英俄之间的帝国主义斗争永远不会缓解,英国迟早将被迫按照德国提出的条件与德国结盟。德国外交部并没有因为1898年和1901年两度与英国商谈结盟未果而太过失望。1904年《英法协约》没有动摇

德国人的信念,德国外交部仍然认为英法分歧难以克服。1905年3月威廉二世在丹吉尔登岸时宣称在访问独立的主权国家,批评法国威胁到德国在摩洛哥的商贸活动,但这种挑战没有达成对英法关系的楔子战略效果,反而开启了1906年英法军队参谋人员的非正式谈判,英法开始制订共同的针对德国的军事行动计划。^⑩1905年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明确表示,政府的更迭丝毫不意味着外交政策的变化。他授权帝国防务委员会从1906年元旦开始与法国举行全面会谈。^⑪

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法国采取了比较缓和的姿态,坚决反德的法国外交部部长被解职。此后,德国对法国施加的压力反而加大。哈尔丹赴德国谈判期间,德国提出了有利于英国的建议,即英德主力舰数量比例为3:2,但被英国拒绝。提尔皮茨从一开始就把德国海军谋划成向英国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德国试图建设一支足够强大的海军舰队作为威慑力量,以便使德国能够影响英国。到了1914年,尽管这一尝试已经失败,但这场赌博却在英德之间产生了左右舆论的效果,营造了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的气氛。^⑫陆地与海洋战略的窗口期判断有很大差别,德国陆军从1905年开始就具备进攻顶点优势,在1914年相对优势下滑,但由于海军准备不足,提尔皮茨一直在拖延预防性战争的进程。在1914年7月“德皇威廉运河”能够允许通过无畏舰通行时,提尔皮茨不再反对德国发动战争。^⑬1913年年底,俄国政府通过了一个军事计划,要建立一个大为扩充的战略铁路网,以便爆发战争能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集结部队。该计划预计在1917年全部到位。德国应对两线作战的计划依赖于俄军缓慢的动员速度,而铁路设施的完善无疑将提高俄军的动员速度。法俄陆军扩军与英国海军扩军一样是与德国大规模扩军同时发生的,也是对德国大规模扩军做出的回应。到1914年10月,德国陆军数量将扩大到81万,但法俄两国的常备军数量仍大约将是德奥两国常备军数量的两倍。^⑭

德国曾许诺,如果德法爆发战争,英国同意保持中立,那么德国就会停止海军军备竞赛,但英国拒绝了这一建议,德国认为这表明英国政策的反德本

质。英国从战略进取到战略收缩;俄国在远东、中亚和中东,法国在亚洲、中东和北非,德国在远东、中东、非洲和西欧,日本在远东,美国在太平洋都对英国构成地缘政治挑战。但对英国而言,其他方面都是有限和长远的威胁,最突出的问题是德国海军扩张的挑战,德国建造舰队的决定所包含的危险是直接而猛烈的。德国对外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国内政治的不稳定对德国军方施加了巨大压力,它在战略传统上侧重赢得速胜的有限战争,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但威廉二世时期的海军和陆军部门都旨在应对总体战和持久战,没有为战后外交妥协留有足够的回旋余地。

在沉没成本方面,军备计划一旦启动就很难停止,经济和技术过程的逆转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海军竞赛自身难以停止的势头也在英德两国国内创造出既得利益集团。日俄战争的深刻教训是大国交战很可能引发国内革命。德国决策层清楚战争后果,这更凸显了风险接受的决心程度是如何让其陷入战略冒险的。^⑮德国舆论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期盼其到来;另一派着力寻求某种避免战争的出路。^⑯但最终深信战争难以避免的观点占据上风。

在夸大实力威慑效果方面,德国认为假如德国有海军,即使比英国弱小,英国也会在外交上让步,而不愿冒海上冲突的风险。德国的“风险舰队”理论本身就渗透着冒险倾向。德国认为,只要海军发展通过了“危险区”,就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冒险海军”。德国认为自身可以承担财政负担,而英国无力承担。因此德国决定加速造舰计划。从英国来看,只是想通过建立势力均衡以维持和平,防止德国侵略,而不是想对德国当时在欧洲和世界的商业利益进行故意损害。但俄国1907年的协定只是想消除与英国的殖民利益摩擦,如果英国采取反德政策,俄国未必站在英国一边。早在1898年英国就向沙皇倡议订立协约,但遭到俄国拒绝。此后,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获得可以尝试与德国缔结同盟的授权。1908-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前,德法关系通过1909年《摩洛哥协定》有了缓和。1908年德国国会通过了一部海军法案,规定自

1908-1911年每年建造主力舰四艘,1912-1917年每年建造主力舰两艘。德国预期战争风险所带来的威慑效应没有成功,只是强化了三国协约的形成。德国对英国海军霸权的挑战和威胁是英法联盟和英俄协约确立的一大诱因。

在“托克维尔悖论”方面,德国对俾斯麦的地缘政治遗产不满,力图获取更大的战略安全与海外利益,但加速赶超的结果是削弱了原有的安全盈余。威廉二世对德国实际的地缘战略行动影响有限,他相信并希望英国出于尊重而承认德国海军力量的崛起,最终英国可以加入三国同盟。1904年夏,德国的外交处境相比俾斯麦离职时已经大大恶化。英国与法俄存在地缘政治矛盾,让德国始终以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窗口,忽略了三国修好认致德国受到两线夹击的脆弱性窗口。1905年英国对法国更为坚定的军事支援承诺正是德国向法国施压造成的不良后果。

(三)日本与德国案例的历史启示

首先,在近代日本对外战争中,日美实力差距最大,两国缺少历史仇恨与领土争端,对美战争最能体现日本的风险承担决心。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战略透支使其地缘政治空间被大大压缩,从此彻底失去了在亚太地区再次崛起为地区性大国的基本地缘政治条件。^⑤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中获得了安全盈余,本可以规避军备竞赛、联盟对抗和预防性战争等透支风险。尽管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后发动对东亚大陆的军事扩张、与纳粹德国结成进攻性同盟、陷入与美国的太平洋战争,但并不缺乏及时止损的机会窗口,如放弃侵华战争扩大化、与德国联合进攻苏联和避免对美战争等。如果日本没有偷袭珍珠港,那么它的战略透支风险仍然相对可控。1941年日本面临的经济脆弱性和军事进攻窗口虽然较大,但难以通过使用武力逼迫对手让步和确保战略收益,最终陷入了战略资源透支(即在东亚大陆与太平洋两个方向过度扩张)、战略机遇期透支(即美国对日制裁和作战加速及错过与德国夹击苏联的时机)与战略信誉透支(即日美双方增加了战略互疑)。

其次,位居体系中心地带的德国在俾斯麦时期采取巧妙的战略可以实现有利于崛起的风险规避,奉行了必要的风险承担应以不损害安全现状为底线

的原则。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首要利益是均势稳定,但“世界政策”和海洋帝国在本质上是一种针锋相对的地缘竞争路线,即试图同时打破英国海上霸权与欧洲大陆均势的传统二元地缘格局。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对外政策的常态在于不愿将激烈的言辞转变为行动。^⑥威廉二世执政早期,德国的战略偏好是有限战略透支的风险承担,德国不排斥风险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以战争手段追求经济利益。在不波及欧洲本土、没有其他大国卷入、规模有限而且无须投入动用陆军时,德国不太担心战略透支风险。即使在萨拉热窝事件前夕,也很难想象法俄两国会对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德国最终形成战略资源透支(包括英德海军竞赛、德国一法俄陆军竞赛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耗战)、战略机遇期透支(即强化了法俄联盟的对德性质与英国放弃光荣孤立)、战略信誉透支(即在两次摩洛哥危机、波斯尼亚危机、两次巴尔干危机后,德国的意图和行动越发被解读为修正主义)的代价。英国高估了法俄两国海军的危险,英国海军的扩建又被德国视为威胁,英德冲突升级又加剧了德国的军事化进程,后者又强化了法俄两国对德国的威胁认知。^⑦

最后,崛起国的战略决策会同时受到来自前景评估和历史类比的窗口预期影响。战略模糊增加了可信度的相对重要性,依靠表明可信度来使他国确信它们是认真的,随之就会发生为维护名誉而进行的战争。在那些具有或认为具有更大的进攻性机会和防御性弱点的国家(特别是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常常选择风险承担行为,而在那些拥有安全边界和很少进攻性机会的国家(如地缘环境优越的英美国家)则较少选择类似行为。但也存在反常逻辑,享有安全盈余的国家(如近代日本)也可能由于短期一机会窗口预期透支有限的国力,明知失败的严重后果,也要发起冒险战略。从解释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看,周期模式优于兴衰模式。周期模式着眼于国家如何克服危机,风险承担与风险规避带来的挑战都可以进行战略纠错,崛起阶段可以延长,复兴阶段也能再生。

五、结论

战略动机、地缘政治地位、经济相互依赖和军事

攻防平衡对崛起国的窗口预期类型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消极窗口预期形成后会产生沉没成本、夸大实力威慑效果和“托克维尔悖论”的作用机制,导致螺旋模式的冲突升级;反之则形成威慑模式的冲突管控,崛起国倾向于风险规避。真正高明的崛起战略是保持手段选项的多重性,不轻易逼迫己方和对手国做出非战即亡的二元选择。对国家如何应对战略透支风险的研究可以为出现透支风险的早期阶段如何及时止损提供参考。崛起国应使战略目标向战略能力偏移,而非战略能力向战略目标偏移。现实主义与地缘政治的精髓都在于战略克制,国家在任意方向的过度扩张都会导致另一方向受到相应挤压并不得不出相应的战略收缩。^⑧权力增量不应影响权力存量。国家权力的绝对量与相对比较量增长,并不表明该国权力的投射能力和影响力增加。如果面临的外部制衡压力在同步甚至更快增长,就会降低权力盈余、诱发战略透支风险。一国在军备竞赛过程中可能决定迎头赶上,但并不一定认为有必要以最快的速度追赶。一个国家对他国给自身造成的威胁的意识程度要比对自身给他国造成的威胁的意识程度更大。

本文未能解答的问题是维持现状行为与修正主义行为、维持现状国家与修正主义国家的区分能否对窗口预期的战略影响进行更精确的判断。因为国家很少能清楚无误地表达自己的战略决心,所以修正主义国家很容易认为维持现状国家最终会让步。如果一国把对手国误认为维持现状国家并据此做出让步,同时对手国又没有意识到该国的政策基于错误的认识,这种让步就很可能产生误解。即使对手国的目标不是占据统治地位,但如果在高度冲突条件下做出让步,对手国就会认为可以利用该国改善关系的意愿提出新要求。此外,还可以对窗口预期在形成与作用过程战略互动进行地缘政治视野下的考察:大陆强国在崛起进程中缘何推进海上战略扩张以及不同的扩张类型会带来多大程度的战略透支风险?主导性海洋强国在面对权力转移和新兴大国挑战时,会采取哪些地缘战略来延缓霸权衰落进程,对霸权地位的窗口预期会产生怎样的战略效果?这些都可以作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注释:

①徐进:《时间维度与战略目标》,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1期,第1-23页;J.F.C.富勒著,胡毅秉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战略与战术》,台海出版社2018年版,第25页。

②参见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51, No.1, 1998, p.146; Dale C. Copeland,"Neorealism and the Myth of Bipolar Stability: Toward a New Dynamic Theory of Major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5, No.3, 1996, pp.29-89; Randall L. 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p.72-107;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Eric J. Labs,"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Aims," *Security Studies*, Vol.6, No.4, 1997, pp.1-49。

③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Glenn H. Snyder,"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1 2002, pp.149-173。

④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1-55。

⑤斯蒂芬·范·埃弗拉著,何曜译:《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8-89页。

⑥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2页。

⑦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9页;Jack Snyder,"The Domestic Political Logic of Gorbachev's New Thinking i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8, No.4, 2011, pp.562-574; Fareed Zakaria,"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7, No.1, 1992, pp.177-198。

⑧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94-226。

⑨Glenn H. Snyder,"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A Review Essay," pp.149-173;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04-255页。

⑩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

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108页。

⑪ 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2, No.2, 1950, pp.157-180; Charles L. 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50, No.1, 1997, pp.171-201.

⑫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69页；Kenneth N. Waltz,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18, No.4, 1988, pp.615-628; Kenneth N. Waltz, "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 *Daedalus*, Vol.93, No.3, 1964, pp.881-909.

⑬ 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宋伟等译：《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212页；Barry R. Posen,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67-69; 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 Santa Monica: Rand Press, 1977, p.8.

⑭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429-438; Richard Ned Lebow, "The Long Pea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Failure of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2, 1994, pp.249-277.

⑮ 乔治·凯南著，雷建峰译：《美国大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159页。

⑯ 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72页。

⑰ 卡伦·明斯特等著，潘思岐译：《国际关系精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9-191页。

⑱ 关于大战略理论，具体可参见约翰·柯林斯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大战略》，战士出版社1978年版；时殷弘编：《战略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周丕启：《大战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Paul Kennedy,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Edward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Thomas Schelling, *The Reciprocal Fear of Surprise Attack*,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⑲ 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4-86页；Robert G. Gilpin, "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8, No.2, 1984, pp.287-304; Robert G. Gilpin, "Three Models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9, No.1, 1975, pp.37-60.

⑳ 查尔斯·格拉泽著，刘丰等译：《国际政治的理性理论：竞争与合作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33-275页；Charles L. Glas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 *World Politics*, Vol.44, No.4, 1992, pp.497-538.

㉑ 杨原：《对抗还是让步？——大国崛起进程中的鹰鸽策略取舍逻辑》，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5期，第4页。

㉒ 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的战略博弈信号有明显差别：超级大国在地缘政治核心地带的利益扩展会被战略对手国解读为改变现状的重大进攻性信号，在边缘地区扩展利益则被解读为微弱的进攻信号。参见姜鹏：《两极竞争背景下的“边缘诱捕”战略及其效用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4期，第120页。

㉓ 威廉森·莫里等编，时殷弘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㉔ 确定因果机制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原因与结果之间要有相关性；二是原因与结果之间要有时间上的先后次序；三是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引发机制，即原因通过某种确定的机制导致结果的产生。参见包刚升：《政治学通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8页。

㉕ 唐世平：《观念、行动、结果：社会科学方法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57页。

㉖ 格尔德·吉仁泽著，王晋译：《风险认知：如何精准决策》，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22-53页。

㉗ 决策者会根据预期水平对各种战略选项加以框定，预期基于未来而不局限于现状。如果过去的地位和收益比现状合意，决策者会把此前最高收益时期作为参考点。决策者将预期结果达到或超过参考点的情况视为收益，而将低于参考点的情况看作损失。在个体决策中，损失厌恶驱动风险规避，但群体决策的风险倾向并不是其个体成员风险倾向的总和。参见 Mark L. Haas, "Prospect Theory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5, No.2, 2001, pp.241-270; Jeffrey D. Berejikian, "Model Building with Prospect Theory: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3, No.4, 2002, pp.759-786.

㉘ Jack S. Levy, "Ap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to Political Science," *Synthese*, Vol.135, No.2, 2003, pp.215-241; 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

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1, No.1, 1997, pp.87-112; Jack S. Levy, "Loss Aversion, Framing and Bargaining: The Im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f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7, No.2, 1996, pp.179-195; William A. Boettcher III, "The Prospects for Prospect Theory: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pplications of Framing and Loss Avers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5, No.3, 2004, pp.331-362.

②但在特定条件下,一个追求安全动机的国家也会推翻现状(如果更多地缘政治扩张会增加安全边界),并且会重视进攻性手段升级(如果战争、军备竞赛、联盟对抗等会削弱对手国现在和未来进攻自身的力量),因此战略动机不能单独解释国家的扩张行为。具体参见巴里·布赞著,闫健等译:《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301页。

③这里的维持现状是指对现有的权力分配与国际秩序基本满意,有限修正主义是尽量谋求以风险规避的渐进式路径来改变现状,全面修正主义是以风险承担的挑战路径来改变现状。无论是有限修正主义还是全面修正主义,都不意味着国家会放弃战略理性,趋利避害和成本—收益权衡是国家的基本考量。

④宋伟:《国际关系中的修正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述评》,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33页。

⑤罗马为了避免被埃特鲁斯坎人、高卢人和闪米特人征服统治,通过在意大利和西部帝国的征伐来实现自保,不惜劳民伤财将迦太基人赶出西西里岛是为了消除安全威胁等消极目标,而不是为了获得海外属地等积极目的。参见布林哈曼著,刘智译:《罗马共和国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9-90页。

⑥17世纪,荷兰的贸易、金融和海军实力居全球首位,具备全球领导力量。但随着法国的崛起,英国结束了同荷兰的战略竞争并与之结盟,数次与法国交战。法国大革命后,其他国家形成了针对法国而非英国的均势联盟。20世纪早期又形成了针对德国而非英国或美国的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是针对苏联而非美国。500年来的世界体系中几乎没有任何针对全球海洋霸权国的均势联盟出现,后冷战时代缺少对美国的硬制衡并非例外。

⑦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拥有海上优势,斯巴达享有同等实力的陆上优势。雅典为了弥补陆权脆弱性修建了城墙,斯巴达为了对抗雅典海权接受了波斯帝国的援助。这是典型的海权与陆权的对抗。

⑧地理位置无论有利与否都属于战略的范畴,争取地理位置的任务需要战略布局。大陆与海洋地理位置的战略影响差异:陆上地势多变、战略选择灵活多样;海上策略受海岸线形态和航线的地理位置影响,选择有限、空间限制较小、不受国家边境线的历史变化影响。

⑨1688-1713年,法国对抗奥格斯堡联盟与发起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战略逻辑是一致的,法国担心如果奥地利得到西班牙的全部继承权,就意味着法国可能会被势力强大的国家实施地缘政治包围。英国和法国在1756年发生冲突,双方都认为如果对方在北美占据优势,它自身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法国在1792年发起进攻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担心受到攻击。俄国卷入克里米亚战争的动机之一是为了防御性地保护侧翼地区安全。

⑩罗马崛起于希腊化世界的政治中心的侧翼地区;葡萄牙和西班牙也是在当时的法国、意大利、奥地利三角地区构成的权力中心之外完成了政治和经济崛起。18-19世纪的英国,在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基础上保持海权优势地位。作为欧洲大陆侧翼国家,俄国自北方大战战胜瑞典以来,通常只需应对一个地缘方向的威胁和挑战,这有助于它实现了陆域蚕食和水域开拓,即使出现战略透支也能维持自保。参见赫尔弗里德·明克勒著,程卫平译:《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0-57页。

⑪这里根据米尔斯海默的概念做了引申界定:权宜自由主义主张不采取进攻性行动实现修正主义的经济目标,进步自由主义强调通过更高成本的主动干预实现修正主义的经济目标。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著,李泽译:《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0-111页。

⑫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4-35;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4, 1996, pp.5-41.

⑬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35.

⑭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11.

⑮这是因为陆军需要长时间驻守根据地维持常态化存在,陆上邻国众多的国家更是将消耗巨大的防御成本;海军只需控制和守卫海上航线和交通枢纽,凭借机动性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实现海疆安全和经济战略目标。海军的全球投送要比陆军部署更少激发对手国敌意,海军外交能够带来政治和经

济双重附加值。参见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第50页。

③巴里·布赞著,薛立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

④进攻方主要想知道反馈有多大效果,而非防御方是否会做出反馈。军事手段的模糊性常常难以区分防御意图和进攻意图,因为技术的持续压力、保持军事力量的维持现状行为和军备竞赛的挑衅行为往往难以分辨。参见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第283-287页。

⑤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军事成果逐渐扩散到敌对国家。从1686年开始,法国地位的恶化程度比路易十四的预期还要严重。它可能产生两种作用:降低或提升风险承担决心;对战略透支的影响是间接和复杂的。参见Richard Dawkins and John Richard Krebs,"Anns Races Between and Within Specie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Biological Sciences*, Vol.1161, No.205, 1979, pp.489-511; Charles L. Glaser,"When Are Arms Races Dangerous? Rational Versus Suboptimal Arm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8, No.4, 2004, pp.44-84; Andrew Kydd,"Arms Races and Arms Control: Modeling the Hawk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4, No.2, 2000, pp.228-244。

⑥George W. Downs, David M. Roocke and Randolph M. Siverson,"Arms Races and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s*, Vol.38, No.1, 1985, pp.118。

⑦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1页。

⑧国家增强军力的动机包括:资源具有累积性、自卫更加困难、国家更期待战争,战争的初期阶段更具有决定意义、国家把用于防御的军事资源转为用于进攻、国家更严格保守军事机密、国家间达成的军备控制协议更少。参见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第162-163页。

⑨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第264页。

⑩Charles L. Glaser and Chairn Kaufmann,"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How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4, 1998, pp.44-82。

⑪巴里·布赞:《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第93-102页。

⑫“时间贴现”是指对事件价值量估计随时间流失而下降的心理现象,行为体倾向于选择风险承担。参见Richard Breen, Herman G. van de Werfhorst and Mads Meier Jæger,"Deciding Under Doubt: A Theory of Risk Aversion, Time Discount-

ing Preferences, and Educational Decision-Making,"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30, No.2, pp.258-270。

⑬国家加强军备的原因是认为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威胁,军备主要是由外部因素推动,任何潜在的敌对国家增强军事力量的行动,在其他国家看来都是威胁的增大,这使它们做出反应以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如果军备发展超过某个点,多余的杀伤力将使军事能力收益递减,然而由于象征原因仍然有吸引力。如果防御非常强大,任何一方都不能在一个宽广的实力对比范围内征服另一方,所以只有出现非常巨大的实力对比变化时才有政治意义。同样的战略目标(如维持现状)可能用不同的军事战略来完成(如进攻性或防御性的军事战略),而进攻性或防御性的军事战略又可能以相同的军事能力执行。

⑭约翰·米尔斯海默著,阙天舒译:《常规威慑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5-50页。

⑮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页。

⑯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第89页。

⑰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第33页。

⑱杨虎涛、刘方:《从体制性吸纳到建制性协商——从托克维尔悖论谈起》,载《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79-84页。“托克维尔悖论”是借助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论述提出的概念,即人们受的苦可能减少了,但他们的敏感度提高了,对平等的期望快速增加。参见Daniel Bell,"Alexis de Tocqueville: At the Crossroads of History," *Tocqueville Review*, Vol.20, No.2, 2005, pp.177-190。

⑲Hal R. Arkes and Catherine Blumer,"The Psychology of Sunk Cos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Vol.35, No.1, 1985, pp.124-140; Stefan Roth, Thomas Robbert and Lennart Straus,"On the Sunk-Cost Effect in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A Meta-Analytic Review," *Business Research*, Vol.8, No.1, 2014, pp.99-138。

⑳唐世平著,林民旺等译:《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187页。

㉑前者主要是指崛起国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要求扩张自己的利益以及获得更多承认和尊重;后者基本就是前者的镜像,是指既有大国面临“衰落”的威胁时,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不断被放大。参见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定定等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版,第71页; Oriana Skylar Mastro, "In the Shadow of the Thucydides Trap: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rospects for Peace in U.S.-China Rel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24, No.1, 2019, pp.25-45; Brandon K. Yoder, "Uncertainty, Shifting Power and Credible Signals in US-China Relations: Why the 'Thucydides Trap' Is Real, but Limited,"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24, No.1, 2019, pp.87-104; Gregory J. Moore, "Avoiding a Thucydides Trap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7 Reasons Why That Might Be Difficult)," *Asian Security*, Vol.13, No.2, 2017, pp.98-115。

②战略透支问题反映资源消耗与资源汲取之间的匹配程度问题,战略目标偏移与过度夸大对手国威胁和抓住自身机会窗口有关。参见章珏、徐进:《大国战略透支研究》,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51、82-83页。

③战略目标的设定与战略行动的效果会受到时间维度的影响,当崛起国急于求成缩短战略目标的执行时间时,就可能由于夸大外部威胁、机会窗口与突发事件的影响,导致冒险战略。参见徐进:《时间维度与战略目标》,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1期,第1-23页。

④阎学通将国际领导类型分为王道型、霸权型、昏庸型和强权型,认为不同的领导类型产生的战略信誉效果不同,对大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风险和成功概率具有重要影响。参见阎学通著,李佩芝译:《大国领导力》,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36-93页。

⑤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第101-102页。

⑥Euan Graham,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34, No.2, 2008, pp.517-521;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174.

⑦克莱格·尼尔森著,宋世锋译:《珍珠港:1941,现代美国命运的转折》,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40页。

⑧约翰·查尔斯·史乐文著,刘旭东译:《“兴风作浪”:政治、宣传与日本帝国海军的崛起:1868-1922》,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4页。

⑨日本的扩张企图后来日美两国对抗升级埋下伏笔:1911年辛亥革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改变了地缘环境,日本领导层看到并利用了扩张窗口,违背了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美国塔夫脱和威尔逊两届政府采取了更具理想主义的政策主张。这些都加深了日美关系的安全困境。日本在该时期的风险规避与相对积极的窗口预期也隐

含着后来冲突升级的助推变量。参见五百旗头真编著,周永生译:《日美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56-76页;亨利·J.亨德里克斯著,王小可等译:《西奥多·罗斯福的海军外交:美国海军与美国世纪的诞生》,海洋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222页。

⑩此后日本不满足与美国海军的条约比例,更多源于对地缘政治地位的荣誉和民族自豪感诉求以及寻求与美英平起平坐的海军地位。

⑪Norman Rich, *Great Power Diplomacy: 1814-1914*, London: McGraw-Hill Education, 1992, pp.324-328.

⑫以加藤宽治为代表的反对势力重申新马汉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1923年的《帝国国防方针》,坚持认为“在中国市场的矛盾会导致美日之间爆发战争”,只是此时日本的和平方针还没有发生根本动摇。参见麻田贞雄著,朱任东译:《从马汉到珍珠港:日本海军与美国》,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145页。

⑬约翰·查尔斯·史乐文:《“兴风作浪”:政治、宣传与日本帝国海军的崛起:1868-1922》,第229页。

⑭约翰·查尔斯·史乐文:《“兴风作浪”:政治、宣传与日本帝国海军的崛起:1868-1922》,第11页。

⑮即不超过8年舰龄的8艘战列舰和8艘装甲巡洋舰以及充足的辅助舰只。参见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日本海军与美国》,第19-59页。

⑯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日本海军与美国》,第19-63页。

⑰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日本海军与美国》,第107页。

⑱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日本海军与美国》,第109页。

⑲这次海军会议导致日本海军内部支持和反对军备限制势力的矛盾公开化。多数日本海军军官认为《伦敦海军条约》是一个强加给日本的比例,客观上削弱了日本的温和派和华盛顿体系。但美国方面有相反的乐观认知,认为这将会带来与日本温和派合作而形成的友好邦交。这表明日美两国的窗口预期出现了误判。参见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日本海军与美国》,第178-180页。

⑳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王珊等译:《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163页。

㉑1904年日本发动对俄战争是因为日本把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活动视为对朝鲜半岛现状的挑战,是对日本扩张性安全利益的严重威胁。

㉒五百旗头真主编,吴万虹译:《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

2010》,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③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pp.397-401.

④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191-198页。

⑤ 段廷志:《日本结盟战略与实践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6页。

⑥ 两国早期都经常面临强敌入侵的威胁;拥有大量军国主义人才;拥有大量技术梳理的航海人才和造船专家;拥有的自然资源比较少;都需要谋求海洋资源。日本在地理上是一个海权国家,对大陆领土的占有欲必须节制,否则会透支有限的资源。参见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著,蒋宗强译:《海权》,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8页;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何黎萍译:《图解大国海权》,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4-215页。

⑦ 爱德华·德瑞著,顾全译:《日本陆军兴亡史:1853-1945》,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91-219页。

⑧ 小代有希子著,张志清等译:《躁动的日本:危险而不为人知的日本战略史观》,广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⑨ 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日本海军与美国》,第9页。

⑩ Saul Betnard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4, pp.317-318.

⑪ 克莱格·尼尔森:《珍珠港:1941,现代美国命运的转折》,第33页。

⑫ 张海文等主编,张沱生等译:《21世纪海洋大国:海上合作与冲突管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184页。

⑬ 林肯·佩恩著,陈建军等译:《海洋与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91页。

⑭ 克莱格·尼尔森:《珍珠港:1941,现代美国命运的转折》,第29页。

⑮ 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日本海军与美国》,第68页;Jon Sumida and Daniel Moran,"If Mahan Ran the Great Pacific War: An Analysis of World War II Naval Strategy,"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73, No.4, 2009, pp.1295-1297; 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R. Holmes,"Japanese Maritime Thought: If Not Mahan, Who?"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59, No.3, 2006, pp.22-51.

⑯ Richard J. Norton,"The Pacific War and Contingent Victory: Why Japanese Defeat Was Not Inevitabl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70, No.3, 2017, pp.163-165;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153; Ronald H. Carpenter,

"Admiral Mahan, 'Narrative Fidelity' and the Japanes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Vol.72, No.3, 1986, pp.290-305.

⑰ 爱德华·德瑞:《日本陆军兴亡史:1853-1945》,第308、326页。

⑱ 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91-297页。

⑲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p.165-167.

⑳ Ruddock F. Mackay,"The Admiralty, the German Navy,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the British Fleet, 1904-1905," *The Mariner's Mirror*, Vol.56, No.3, 1970, pp.341-346;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203.

㉑ Saul Betnard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318.

㉒ 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第102-104页。

㉓ 克莱格·尼尔森:《珍珠港:1941,现代美国命运的转折》,第27页。

㉔ Sybil Crowe and Edward Corp, *Our Ablest Public Servant: Sir Eyre Crowe, 1864-1925*, Braunton: Merlin Books, 1993, pp.110-119; Nicholas A. Lambert,"Admiral Sir John Fisher and the Concept of Flotilla Defence, 1904-1909,"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9, No.4, 1995, p.639.

㉕ 在德国看来,对欧洲大陆主导权的追求和对德意志统一的敌视等因素都很可能驱使法国进攻德国。共和制的法国(得不到英奥俄等君主制大国的认可、国内资源汲取能力也不足)要比正统君主制的法国更有助于德国实现孤立它的战略目标。

㉖ 埃里克·埃克著,启蒙编译所译:《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199页。

㉗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239-240页。

㉘ 梅然:《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4页。

㉙ 赫伯特·里奇蒙德著,陈炎译:《政治家与海权》,济南出版社2021年版,第253页。

㉚ 秦立志:《崛起大国战略转型的动力机制与历史启示——体系变革与战略塑造》,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64-365页。

㉛ William Langer, *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

1871-1890, New York: Alfred E. Knopf, 1956, p.199.

⑫沃尔夫冈·韦格纳著,罗群芳译:《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德国公海舰队的悲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33页。

⑬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国际战略十一讲》,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123页;David Levi-Faur, "Friedrich List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ation-St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4, No.1, 1997, pp.154-178; Onur Ulas Ince, "Friedrich List and the Imperial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21, No.4, 2016, pp.380-400。

⑭Paul Schroeder, "Necessary Conditions and World War I as an Unavoidable War," in Gary Goertz and Jack S. Levy, eds., *Explaining War and Peace: Causal Explanations, Necessary Conditions, and Case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148-193.

⑮James Joll and Gordon Marte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209.

⑯徐进:《进攻崇拜:一个理论神话的破灭》,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第83页。

⑰时殷弘编:《战略二十讲》,第47-48页。

⑱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

⑲James Joll and Gordon Marte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95.

⑳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盖之珉译:《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权谋的一生》,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37-177页。

㉑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p.78.

㉒悉尼·布拉德肖·费伊著,于熙俭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大国博弈之殇》,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版,第77-215页。

㉓奥匈帝国的初始战略目标是染指塞尔维亚,俄国在东西欧追求现状政策,英国意图维持欧洲大陆均势,法国对德国的历史复仇记忆并没有转换为进攻性战略行动,德国的施利芬计划和提尔皮茨计划则基本是将英国、法国、俄国同时作为假

想敌。考虑到奥匈帝国与德国的攻守同盟关系,一旦开战势必让奥匈帝国卷入其中,并且这种全面战争计划缺乏冲突升级的克制门槛,可以说德国承担战略透支风险的决心最大。在“萨拉热窝事件”后,德国没有对英国警告不要进攻低地国家足够重视,因此德国对战争的爆发起到了主导性推动作用。

㉔James Joll and Gordon Marte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71.

㉕James Joll and Gordon Marte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78.

㉖Geoff Eley, "Reshaping the Right: Radical Nationalism and the German Navy League, 1898-1908,"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21, No.2, 1978, pp.327-354; James Joll and Gordon Marte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p.63-64.

㉗Henrikki Tikkanen, "Leader Personality, Managerial Attention, and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The Adoption of the Battlecruiser Concept in the Royal Navy, 1904-1918,"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History*, Vol.12, No.1, 2017, pp.47-75; James Joll and Gordon Marte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65.

㉘James Joll and Gordon Marte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99.

㉙James Joll and Gordon Marte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77.

㉚Norman Rich, *Great Power Diplomacy: 1814-1914*, pp.435-436.

㉛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p.83.

㉜James Joll and Gordon Marte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72.

㉝张文木:《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第39-40、48页。

㉞保罗·肯尼迪著,时殷弘等译:《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㉟保罗·肯尼迪著,沈志雄译:《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193页。

㊱张文木:《地缘政治的本质及其中国运用》,载《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8期,第1-14页。